

## 前言

《牧场岁月》是叶秋怡的一篇长达四万四千字的生动回忆录，被颇获读者青睐的“新三届”在网上节选刊登，得到广泛好评。感谢秋怡的信任，将原稿提供给《钟声》酌需取用。《钟声》第 27、28 期连续刊登了本文的部分章节。现将全文刊登在北美位育人网站的“笔苑”上，供校友老师们阅读欣赏。

据“新三届”数据统计，1977 年 12 月高考恢复，当初分配进上海牧场的十四位 66 届高中生中，有十位参加高考，全部考上了大学，至今有九位定居海外。



# 牧场岁月（上篇）

## -养牛挤奶

### 前言

从1968年到1978年，我在上海市牛奶公司第十二牧场工作，前八年当挤奶工，在牛棚里养牛挤奶，后两年当牧场的厂医。这十年，我从20岁到30岁，是人生中精力最旺盛的年代，那段养牛挤奶的经历，无比鲜明地印刻在生命中，融入血液里，以另外一种形式滋养着我。1978年离开牧场后，上大学，读研究生，出国留学，在海外工作定居。几十年来，多少次梦回故地，最多梦见的却是当挤奶工时的情景：奶牛，牛棚，还有师傅和徒弟们，一次次出现在我的梦境里。2003年秋，在出国十八年后回到上海，乘车疾驶在漕溪路上，经过当年养牛挤奶的地段，虽然牛棚早已荡然无存，只见到耸立在故地上的高楼大厦，心中依然一阵震撼。

### 初进牛棚

1966年夏，伟大领袖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此时我即将高中毕业。6月17日中央宣布取消高考制度，学生们停课闹革命，接着下乡学农，到工厂学工，滞留在上海市第五十一中学里。两年后，终于要分配了，我们学校的66届高中生得到一批上海牛奶公司的名额，我幸运地被分配到上海牛奶公司第十二牧场。1968年7月28日去牧场报到，被分在第五生产组当挤奶工。

至今还记得初进牛棚的情景。那是一个炎热夏天的下午，我穿上本白粗布的工作服，工人们称之“号衣”，跟着四位挤奶师傅们一起踏进牛棚。原本卧着休息的奶牛们见我们进牛棚，纷纷站起，热切地等待着。两位挤奶工分别到两排牛食槽前，手脚麻利地将由各类谷粉组成的精料加水搅拌，再一桶桶地分到每头牛前，分到精料的牛伸展着大大的舌头

匆忙舔吃着，尚未分到料的奶牛们摇头晃脑，呼呼地喷着吐沫，不耐烦地等着自己份额的到来，拴着牛头的绳子牵动着系在牛架的铁环，敲打得丁丁当当直响，好不热闹。

带领我的师傅叫顾根余，他安排我先去刷牛身。奶牛每天需刨刷两次，这不仅是为了清洁，更是有助奶牛的血液循环。我贴近牛身，用铁皮制的牛刷，从牛背到牛尾唰唰地刨牛身，刨出了不少牛毛和干牛粪。刷完牛身，再用竹扫帚把刨出的牛毛牛粪掸掉。经过这么一番打理，牛身油光发亮。待到刨刷完十九头奶牛，我站在牛棚中央的水泥道上，看顾师傅打扫牛棚。只见他左手拿水桶泼水，右手用扫帚洗刷奶牛的后脚和地面。水泥道的两旁是两排牛屁股，突然，一头牛飞快地掀起尾巴，一大泡尿倾盆而下。一会儿那边的一头牛缓缓地撑起尾巴，当牛尾巴挺直到与背脊一样平时，粗大的粪便涌了出来，啪啪啪地落到地上，地上聚积起比面盆还大的一堆牛粪，四处飞溅的牛粪飞到我的工作服和脸上，用手一抹，发现奶牛粪与人粪一样，臭臭粘粘的，不由得感到恶心。但是不敢表现出来，我们是刚出校门的学生，来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就是再脏再累也得忍着。

我呆呆地看着顾师傅利落地冲洗，清洁工宋妈瞪着我说：“愣着干什么，快给师傅拎水去！”我这才醒悟，匆匆地去提水给师傅。后来才知道，洗牛腿是挤奶前的必要的准备工作，否则，夹在两后腿中间的牛乳房很容易沾上牛粪，在挤奶时牛粪就有可能掉入挤奶桶，弄脏牛奶。

待牛头前的工人分发完精料，牛棚也已冲洗干净。清洁工继续给奶牛分发青饲料。挤奶工们要开始挤奶了，他们一手提着挤奶桶，一手用小板凳勾着盛满热水的水桶，走到牛身旁，坐在小板凳上，先用热毛巾清洗和热敷奶牛乳房。在热水刺激下，牛乳房开始泌奶，整个乳房渐渐变硬，那是奶阵下来了。此时挤奶工需抓紧时间，尽快把牛奶挤出来，若挤得太慢会引起牛奶回流，从而导致奶产量下降，严重时还会引发乳房炎。他们用双膝夹着挤奶桶，两手握住两乳头，一上一下地开始挤奶。只见两条雪白的乳液源源不断地射进奶桶，冲击着奶桶壁铮铮直响。仅十多分钟就挤了一满桶奶。每挤完一头牛，还需把挤出的牛奶过磅称重，记录该牛的产奶量，然后将牛奶倒入大牛奶桶，待到挤完牛棚里所有的泌乳牛，我们用人力拖车将几大桶牛奶送到牧场的制冷站，奶槽车定时来收集牛奶，运到乳品二厂去消毒装瓶，供应市场。

这挤奶过程看似简单，等到我开始学挤奶时才知道其中不简单。首先是坐在高仅半尺的小板凳挤奶就折腾得我双腿酸得不行。顾师傅告诉我，现在有小板凳坐还算是好的，以前挤奶不准坐小板凳，得蹲着挤奶，那才辛苦。几天过去了，我双腿适应了小板凳。不过，双手要适应高强度的手工挤奶，则足足化了半年多时间。手工挤奶并非简单的握拳，每挤一下，从食指到小指是依次握紧，才能将牛奶从乳头的根部挤出。每个挤奶工每一潮要挤近八至九头牛，需几千次的挤奶动作。我刚开始学挤奶时，一潮奶挤下来，双手又酸又疼，进而麻木失去触觉感，手摸在桌面都感觉不出光滑或粗糙。夜里睡觉醒来，两只手半张半握地痉挛着，无法移动，得过好一会儿才能伸展手指。我的双手经过半年多才渐渐恢复触觉，终于能适应了挤奶劳作了。这时，我对牛粪牛尿早已习以为常，即使脚趾缝里常常镶嵌着干牛粪也毫不在乎。

## 第十二牧场和惠民牛棚

第十二牧场原来叫华德牧场，文革时才改的名，由十几个原私营小牧场公私合营组成。牧场主有不少来自宝山县或嘉定县，那里是江南富庶的鱼米之乡，有“金太仓，银嘉定，铜宝山”的美称。农民务农得到多余的资金，做起牛奶行业，有的还当上了牧场主。美国前劳工部长赵小兰的族叔赵锡熙就是嘉定人，也从事奶牛行业，后来成了第十二牧场的职工。

那时候国家实行户口与粮食管制，不仅人有户口与定粮，奶牛也有户口与定粮，第十二牧场在册的牛户口是 854 头，其中成年奶牛占 500 多头，其余的是青年后备牛。每头奶牛每天配给的精料是十五市斤。为了供应这八百多头牛的饲料，牧场里有一个相当规模的饲料科，专门采购饲料。采购员经常跑到江浙两省，夏天收购青玉米，秋天收购干草。第十二牧场还有常年饲料地，是新龙华公社的一个生产大队，位于上海南站附近。专为牧场种植奶牛吃的青饲料，诸如青菜，麦苗，胡萝卜等等。

第十二牧场的十几个牛棚分散在上海西南角附近。主要的牛棚群有两个：一个分布在小木桥路斜土路附近，称为东区，牧场总部设在东区。另一个牛棚群分布在漕溪路龙华火葬场附近，称为西区。龙华火葬场前身是龙华公墓，周围有不少乱坟岗，称为坟山地，

因坟山地的价钱便宜，又靠近市区，好几家牛奶棚都建在这里。西区一旁的居民区叫新村，里面的居民大都是从肇嘉浜迁移来的。肇嘉浜以前是条臭水沟，上世纪 50 年代初被填平后，原先住在棚户或船屋里的贫民们被安置到此地，在原坟山地上建起了简陋平房，成为新村。有不少新村的居民在夏天割草卖给牧场，维持他们的部分生计。

我工作的五组牛棚位于新村北端，前身是私营的惠民牧场，那牧场建造得气派，地势比周围地面高出 1 米多，送青饲料的农民都叫它高牛棚。农民送青饲料运牛粪，工人送精料拖热水，都得拼出全力，冲上冲下牧场门口那条短短的斜坡道。因为五组牛群是健康牛群，牛棚的大门口有个池子，常年注着 1~2 寸深的消毒水，进出车辆的轮子都要在消毒池里滚过。惠民牧场的西南部是高敞的牛棚，牛棚的东南方和西北方是两个放牛场，放牛场上覆盖着化工厂的下脚料（俗称三合土），寸草不生。

东北部朝南矗立着一幢三上三下的民居，牧场主夫妇俩原先住在二楼朝东的大房间里，文革开始后，他们被赶到民居北面低矮的小储藏房里居住。那间大房间归牧场所有，后来成了青年女工们宿舍。楼下朝东的大房间依然住着牧场主的儿子一家。一楼朝西的大房间一直是牛棚男工们的宿舍。我的宿舍安排在二楼朝西的后半间。



1970 年摄于五组的放牛场前

一条砖路穿过两个放牛场，把牛棚和民居连起来。路旁有一口水井，初建牛棚时，这儿没自来水供应，牛棚的供水全靠这口水井。通了自来水后，水井就不常用了，井台边上有个自来水龙头，提供牛棚工人及住家的生活用水。在1969年中苏边境紧张时，各个单位都要备战备荒为人民，顾师傅还认真地把水井清理一番。牧场的南端有一个草棚，堆满了干草和稻草，用来喂牛和铺牛棚。东南角还有一小房子，是以前的牛奶制冷间，公私合营后，西区建了大制冷间，这小房子就一直空着。

紧贴牛棚东面是个大敞棚，堆放着一包包精料，还有两口大缸，专盛从葡萄糖厂运来的黄粉，那是从玉米粒提取淀粉后的渣子，拌在精料里喂牛。黄粉特别沉重，一满桶的黄粉重达四十多斤，我刚开始工作时，两手提一桶都不行，渐渐地能两手各提一桶，八十多斤黄粉，提着就走。

敞棚里常年堆着各种青饲料。夏天堆放着很多南瓜给牛吃。十二牧场精打细算，要求南瓜必须先挖出籽后才能喂牛。把挖出的南瓜籽洗净晒干，收集起来，再卖给榨油公司。卖南瓜籽得到的收入甚至可超过买南瓜的成本。而且还留下小部分南瓜籽，在春节期间分给员工，算是员工福利，皆大欢喜。

入秋后，敞棚里堆放着青贮玉米，散发着酸酸甜甜的清香，是秋冬季节时奶牛的重要主食。青贮玉米是将整棵新鲜玉米秸秆连秆带叶打碎后，进行封闭贮藏发酵，称为“青贮”。欧美牧场都有专门的青贮塔，上海早期的《可的牛奶公司》也曾在淮海路厂区里建过青贮塔，后来那地方改成乳品二厂，青贮塔也给拆了。多年后，我定居美国，看到田野里带圆顶的高塔，就知道那里有奶牛场。不过，我当挤奶工时，上海的青贮玉米都用土窖，挖个游泳池大小的坑，预先做好排水道，逐层装填打碎了的玉米秸秆，压紧封土，经过四五十天的发酵熟化，就成了青贮玉米。十二牧场有五六个青贮玉米的土窖。每年七月下旬至八月中旬，是做青贮玉米的季节，那是饲料科和运输队最忙碌的时节。

我们常常在挤完早潮奶后聚坐在敞棚下，进行例行的政治学习，大家围坐在小板凳上，读报或讨论上面发下的文件等等，手里还忙着挖南瓜子。放牛场上，奶牛们在悠闲地溜达。身旁左右堆满各种牛饲料：黄粉，精料，各式青饲料等等。遥望远方，可以看到龙华的千年古塔。后来，我在海外留学工作时，当年坐在敞棚下的情景还经常浮现在脑海里。

## 养牛挤奶

五组的牛棚里有三十八个牛位，配有六个挤奶工和两个清洁工，组成第五生产组。十二牧场的牛棚分散，牧场的运行模式基本延续私营牧场的方式，挤奶工不仅要挤奶，还要给牛喂料，助产，断奶，修理牛蹄，照顾病牛等等，总之，这 38 头奶牛的吃喝拉撒都交给了挤奶工。每个生产组里都有职工宿舍，牛休息时人也休息，一旦牛棚有事，随叫随到。

我们上班时间称三潮两班制，即每头泌乳牛一天挤三次奶，或称三潮，每个工人参加其中两潮的工作。每一潮有三或四个挤奶工和一个清洁工。早潮 7 点开始，中潮下午 1 点半开始，晚潮晚上 9 点开始，直到挤完所有的泌乳牛才收工。故而奶产量越高，工作时间越长。我们五组是高产组，每次挤完奶，将牛奶送到制冷站，总是最后一个组，别的生产组早就完工了。有的组牛奶产量低，一潮工作才一个多小时便能收工下班。

牛跟人一样，都是哺乳动物，泌乳是为了哺育下一代。乳牛要产奶，首先要使乳牛怀孕，十月怀胎后产犊，接着是泌乳的高峰期，泌乳量随时间逐渐减少。乳牛产犊两月后，通过人工授精再度怀孕，到怀孕满 8 个月时，逐渐减少每日挤奶次数，在滞留在乳房的乳汁刺激下，母牛渐渐停止泌乳，也就是断奶，以便让母牛腹中的牛胎儿健康成长，母牛断奶的两个月又称围产期。母牛十月怀胎后，再次产犊，接着又迎来泌乳高峰，如此周而复始。一头牛的折旧率是八年，8 年后就收回成本。记得当年我们生产组生产指标：每头牛每年产 8 吨牛奶和一头小牛。

每当母牛分娩时，挤奶工要在旁守护，有时牛胎儿过大，母牛分娩困难，还需挤奶工助产。记得有一天深夜我和顾师傅在牛棚里等候母牛生产，我实在太疲倦了，就地坐在牛位上，背靠着一头卧躺的奶牛，顾师傅说他早年曾经也这么坐着等候母牛生产，等着等着就睡着了，醒来才发现自己仰天躺在牛肚子下，连那头奶牛何时站起来都不知道。顾师傅还告诉我，母牛分娩有时会很危险，所以要分外小心，以防出意外。以前在私营牧场里，每逢母牛分娩，老板娘就要在牛棚走道上摆香烛台，磕头求平安。母牛顺产，老板娘就以为都是靠她磕头求来的。牧场工人也不与她计较，只是走道上摆了香烛台，工人们干活很不方便。

母牛分娩时，小牛犊两前蹄先伸出母体外，接着出来的是牛头，那是分娩过程中最艰难阶段，我们握着牛犊两条前脚，用力往外拉，同时还得小心不要伤了产道。等到牛犊的最大部位—牛额头分娩出体外，剩下的产程就容易了，稍稍用力，牛犊的胸腹和后腿依次娩出，一头四五十公斤的小牛犊从母体滑落到地上，牛胞里的羊水哗哗地流了一地。我们清除掉牛犊嘴里的粘液，用手挖下小牛犊四蹄的软嫩部分，挖下的八瓣小牛蹄用竹枝串成一串，晒干后就是一味中药，据说专治妇女的产后腿脚无力。刚出生的新生牛犊浑身湿漉漉的，挣扎着，晃晃悠悠地撑起四脚，站起，摔倒，再站起，再摔倒，几番尝试，终于站稳了。老师傅说小牛犊每次摔倒都是在拜谢母恩。

正常状况下，母牛分娩后不久就排出牛胞，此物大补。尤其在冬天，对病弱体虚者很有补益，牛棚工人们都想要牛胞，大家就挨个轮流，我也轮到过好几回。那牛胞很大，放在水桶里，满满的一大桶，清洗后与红枣一起煮熟，冷却后成冻胶状。我妈妈和哥哥们吃了很多，我嫌太腥，尝尝而已。然而，有的奶牛产后虚弱，无力排出牛胞，一连好几天牛屁股后挂着排出一半的牛胞，那就是烂胞了。在夏天母牛经常发生烂胞，这时需要兽医把手伸进牛子宫里，把胎盘一个个剥离子宫后取出烂胞。

与人相似，母牛产后也需要护理，我们把一大包干的益母草，用热水冲泡成汤，又叫苦草汤，给新产母牛喝，促进母牛子宫收缩。此时不能急着催奶，要等十来天，让新产牛身体恢复后再催奶。奶牛过了新产期后，迎来产奶的高峰，高产奶牛的日产量可达60多公斤，一次产奶20多公斤，满满的两大桶，就需两人分别坐在奶牛两旁，同时挤一头牛，称为双挡。两双手握四个奶头一起挤奶，来缩短挤奶时间，防止因挤奶时间太长而引起奶汁回流后的种种恶果。

母牛刚产犊后挤出的奶叫初乳，带血，有轻泻作用。虽然不能作为鲜奶供应市场，也得送往乳品加工厂作其他用途。新生牛犊也需要喝奶，但是不能让牛犊直接从母牛乳头吸吮，怕引起奶牛的母性而从此不让人靠近挤奶。听老师傅说，以前私营牧场时，若产下的小母牛太弱，就让小牛直接吸吮母牛乳头，那小牛就会比较强壮。

喂小牛是件有趣的工作。每潮挤奶结束，用提桶盛上十来斤初乳去喂新生小牛。小牛吸奶的本能动作是仰着头嘴向上，所以得教小牛低头从提桶里喝奶：用手指蘸了初乳，塞进小牛嘴让它吸吮，同时握住小牛嘴，引导小牛头伸进提桶，把嘴浸在初乳里喝奶。小



公牛总是比小母牛笨，往往要教好几天才学会低头喝奶。我喜欢去喂小牛，喜欢小牛那种憨态，即使得化好多力气喂那笨笨的小公牛也乐意。可惜，小牛犊在我们产奶的牛棚里只能待7~8天，然后运输队就来把小母牛送到小牛棚去饲养，而小公牛大都送到动物园去喂老虎，只有极少数的高产母牛产下的小公牛才有幸成为种公牛。听老师傅说新生小公牛的肉含太多水分，不好吃，倘若能养上三十天，就成了鲜美的小牛肉，但是，饲养乳用牛的成本太高，经济价值上不合算，小公牛都直接送到动物园去给老虎吃了。

出于天生的母性，奶牛都会护牛犊。每当我们牵着新生小牛犊经过奶牛前，每头母牛都会伸长脖子，鼻孔耸动着上下左右地嗅着小牛，试图嗅出是否是自己的孩子，它们眼里的黑瞳孔放得很大，眼睛似乎放射着光，那是一种朦朦胧胧的母性的光。记得有一头青年母牛产下头胎，特别护犊，一旦看不到自己的牛犊就不停地叫唤，折腾了好几天才安静下来。而那些经产母牛们老陈持重，似乎看透了世态炎凉，默默地承受着牛世间的苦难。

## 师傅徒弟们

我进牧场工作时，按牛奶公司的规定，刚进牧场的青工，都得先当三年学徒才能成为正式工人。我的师傅是五组组长顾根余，他为人正派，养牛经验丰富，技术高超。那些高难度的工作：修牛蹄，给牛喂药，断奶，到小牛棚里牵青年牛，等等，都得由顾师傅来干。尤其是修牛蹄非常危险。那时上海地区的奶牛患牛蹄病很普遍，主要原因是饲料中缺钙，而频繁的洗牛脚更加剧了病情。患了牛蹄病的奶牛脚踏下被烂穿，一瘸一瘸的行走不便，严重影响奶产量。在修牛蹄时，两个工人紧贴着贴在牛身后，用粗绳绑住牛大腿，把一短棍穿过粗绳，两人合力，往上一提，那牛的小腿离地，顾师傅马步半蹲，抬起牛小腿搁在膝上，左手托住朝天的牛蹄，可以看到牛蹄上烂出大小几个黑色圆洞，大的有铜钱大，顾师傅右手执刀，把牛蹄的腐烂部分削去。然后用药棉蘸着碘酒，塞进烂洞里，再稍加包扎。修理时奶牛感到疼痛而挣扎，尽管有两个工人竭力制止奶牛，还常常是人力斗不过牛力，两人和牛身一起踉踉跄跄地左右挪动，执刀的师傅就可能伤及自己。每次看顾师傅修牛蹄，我都捏把汗，那绝活我始终没学。

相比起修牛蹄，给牛喂药虽然也需两人合作，却轻松得多，一人揪住牛鼻孔，掰开牛嘴，把结实有力的牛舌往外拉出，卡在嘴边，使牛无法闭嘴，另一人迅速地把一罐药水灌进半张的牛嘴里，待那罐药进入牛肚，才放开牛头，那喝完药的牛摇头晃脑，咳嗽连连。我看得有趣，回家后绘声绘色地讲述那情景，还添油加醋地说那是给牛刷牙，妹妹们以为奶牛真的需要每天刷牙，妈妈进一步想象，说牛牙刷一定得像板刷那样大。



2007年我回沪探亲，与龚明奎师傅（左）和顾根余师傅（右）在聚会上合影。

乳牛业是个残忍的行业，靠强制母牛多次怀孕来换得持续产乳。而且当乳牛患病不治，得抢在乳牛断气之前把牛放血致死，这样的死牛才能卖到屠宰场换钱，因为屠宰场拒收自然病死的牛，那就只能火化。牛棚里一旦需要把牛放血致死时，顾师傅是怎么都不愿下手去把牛放血的。他说牛是大畜牲，通人性，我们在牛棚里挤奶，和牛朝夕相处，人和牛都有了感情，怎么下得了手，最后总是由别人去砍那最后的致命一刀。

1972年初，顾师傅生了肝炎，暂时不能挤奶，我接替师傅当了五组生产组长。与师傅多年的养牛经历相比，我既没有那么多经验，又没有强壮体力，只能勉强上位。好在顾师傅家离牛棚不远，有事就去请教师傅。记得在我刚当上组长后不久，一头高产母牛在半夜即将分娩，我怕自己担待不了，骑上自行车去请顾师傅，时值冬天夜里的凌晨一点多，

冰天雪地，我到顾家村叫开门，顾师傅一听，二话不说，立即和我骑车到牛棚，一起在牛棚里待产，直到母牛平安产下牛犊后才回家，此时天都快亮了。

我满师后不久，牧场里新分来一批 70 届毕业生，我带了其中一位当徒弟：小秋，她和我五妹同年，我们师徒俩很投缘。我向她传授自己的体会：当挤奶工就是要学会吃饭睡觉。以前私营牧场里，挤奶工都是男工，需要强壮的体力，喂料时双手需提得动 80 斤的黄粉。男工的定粮是每月 45 斤，我的定粮也已增加到 39 斤。所以女孩子当挤奶工，不能因为顾及漂亮而饿肚子，每顿饭都要吃饱。那时，我每天中午都要吃半斤粮食：三两米饭再加二两的馒头。还要学会抓紧时间睡觉，牛睡觉时人也睡觉，即使离上工只有半小时，最好也抓紧时间在床上睡一小会，上班时不仅工作量大，还得集中精力，在牛棚里干活都是小跑步，不允许懒懒散散，无精打采，挤奶时更是得打起精神，一旦奶牛的奶阵下来，得尽快把牛奶挤出，挤奶太慢会引起奶汁回流，可能会导致牛奶减产甚至乳房炎，挤奶时还要时时警觉，防止因奶牛的突然动作而打翻奶桶或被牛撞倒等意外。

这批 70 届毕业生来自普陀区，我从他们身上了解到上海市民中的另一阶层。常有人把上海地区分成上只角，下只角，我住的徐汇区属“上只角”，中学同学中也有自称工人出身的，其实大都是企业中的白领或老职工。普陀区属“下只角”，徒弟们大都来自产业工人家庭。一位 70 届的小伙子告诉我，他的妈妈姐姐都是纺织女工。有一次到一位 70 届女工家访问，她母亲告诉我她一家是从苏北讨饭来到上海，上无片瓦，下无寸地。与 70 届徒弟和他们的家人交往，我真正认识了上海产业工人这一阶层。他们文化程度虽然不高，但是刻苦耐劳，待人真诚。70 届徒弟们从不为自己的出身和口音而自卑，在那儿，学校里清一色地讲苏北话，即使是出身江浙家庭的学生，在学校里也得用苏北话与同学交谈，不然就被视为异类而孤立起来。他们互相之间都讲苏北话，而和我们讲略带苏北口音的上海话。我与她们讲得投机时，她们常常会情不自禁地“嗯——呐”，随声附和，很是可爱。

小秋在五组挤奶不久，患上了腱鞘炎。那时候，挤奶工的职业病主要有腱鞘炎，甲沟炎和肺结核。挤奶工易患腱鞘炎，因为强烈而持续的手工挤奶动作会引发手上的肌腱发炎，严重时还会引起关节变形，很难治愈。肺结核起源于奶牛易患肺结核，人与奶牛紧密接触，很容易感染。十二牧场的东区是结核病牛群，那里生产的牛奶不能作为鲜奶供应市

场。西区是健康牛群，每年都要进行牛群检疫，一旦查出奶牛有结核感染，立即移出健康牛群。甲沟炎是挤奶工经常发生的疾病：挤奶时双手动作剧烈，在牛棚里工作经常接触牛粪，牛粪中的大肠杆菌很容易侵入指甲缝而引起感染。生了甲沟炎，感染的指缝开始肿胀疼痛最后化脓，往往要十来天才痊愈。若医生不开病假，还得忍痛挤奶，真是十指连心。我第一次生患甲沟炎时的症状最严重，病情发展到中山医院开刀排脓后才痊愈，至今那个手指上还留着当年的刀疤痕迹。后来再患甲沟炎时，症状一次比一次轻，看来这外科疾病似乎也有免疫性。挤奶八年，我几乎每个手指都患过甲沟炎。

小秋患了腱鞘炎，无法继续挤奶，只能调离牛棚，到东区的食堂里工作。一般来说，女工都希望能调离牛棚，那样就能不再从事繁重的挤奶工作，更何况若能在总部食堂工作，那是何等的好事！然而，小秋调到了东区食堂后并不快乐，一次我到总部开会，小秋见到我，眼泪忍不住地流下来。几个月后，听说小秋得了癔病，我去她家探望，她原来梳的小辫已给剪成短发，她父亲胡师傅说，明天就送小秋去精神病医院住院治疗。我劝胡师傅先不要送她去精神病医院，可以试试中医。在新村卫生院里有位王医生，治疗精神方面的疾病很有一套，治好了不少年轻人的精神疾病。胡师傅听从了我的建议。后来，在王医生的中医妙方和胡师傅的悉心照顾下，小秋的癔病果真治愈了。她父亲胡师傅一直很感激我，因为他厂里同事的女儿也患了癔病，送到精神病医院去住院治疗，后来虽说是治好了，然而这女孩从此变得傻傻呆呆的了。

小秋病愈后到牧场上班，执意要回到五组，她因腱鞘炎而不能挤奶，就在牛棚里当清洁工扫牛粪。五组里的工作虽然繁重，但是工人互相之间和睦友好。这时，五组的工人也有很大变动，1973年女工袁英巧调来五组，另一位70届女工小许也参加我们组，我又带了一位74届的学徒：小朱，同时还有从农场来学习挤奶的小王。五组中女工占了大半，现在是女工们把38头奶牛的生产承担了下来，组里依然保持了认真负责养牛的风气，大家一起干活时互相照顾，心情舒畅。小秋在五组当清洁工期间，再次试着挤奶，一年后，她居然又能挤奶了。她的腱鞘炎痊愈了，真是奇迹！可见，一个和谐的工作环境，有多大的威力。

自 2003 年起，我多次回国探亲访友，在上海期间，尽可能与牛棚的师傅徒弟相聚，四十多年过去了，当年花样年华的姑娘们都已为人母，她们的孩子们也已长大成人，有的孩子还学业有成，成为医生。小秋已经当上了祖母，有一个可爱的孙女。



2016 年 11 月在牧场同事聚会上的合影。左起：小朱，小王，我，小秋，小许。

## 农民们

十二牧场的常年青饲料地是新龙华公社一个生产大队，地处上海南站附近，专门为牧场种植各种青饲料，如青菜，麦苗，胡萝卜等。这些青饲料先送到西区分场，再由运输队分送到各生产组。牛棚里的牛粪归青饲料地的生产队所有。每天下午，两位来自饲料地的农妇到我们牛棚拉牛粪。她们与牛棚工人们都很熟，常和我们聊起生产队里的事：某家男人在家打老婆，那女的哀叫声令邻居都听不下去；某家的孩子在南站捡煤核，被火车撞成重伤；等等。有一天她们终于忍不住了，问我：“你这样每天挤奶，觉得苦不苦？”我私下里一直为自己能当上挤奶工而庆幸，然而在这些农妇眼里，我这个戴眼镜的文质彬彬姑娘成天在牛屁股后挤奶，居然是很苦的！

饲料地生产队里有个蘑菇棚，农妇有时会带来蘑菇根卖给我们，蘑菇在供应市场前得把带泥的根切掉，蘑菇根就是切下那段带泥的蘑菇梗，3 分钱一斤。我常买三四斤带回家，和妹妹们把蘑菇根摊在桌上，仔细地削去带泥的根，留下一截短短的蘑菇梗来煮汤，在那物质匮乏的日子里，那是一道美味的菜肴。

由于奶牛吃不少精料，奶牛粪非常肥沃。除了牛粪，牛棚里每天还有不少奶牛吃剩的草料，亦可作肥料。那时候，每个生产组里都有两三位从松江来的农民，长期住在生产组的宿舍里，收集奶牛吃剩的草料。松江出产稻米，肥源缺乏，派出农民到处收集肥料。每天晚上松江农民把收集的草料下脚运到附近的河畔，定期用船运回松江农村。松江农民为了能在牛棚里收集肥料，不仅要讨好牧场工人，还要讨好饲料地农民。他们帮牧场工人喂牛料，甚至还帮助挤奶，时常还从松江带些农产品送给大家。在夜里将草料下脚装车时，他们顺便就偷牛粪藏在草料下脚中运走。工人们不闻不问。而饲料队来拉牛粪的农妇们亦眼开眼闭，因为偷去了牛粪使得她们的牛粪车减轻了不少。

松江农村生产队派出的农民经常轮换，大多是十几岁的小伙子，对大上海充满好奇，一位新来的小伙子想抽空去动物园，事先问我：老虎长不长角？令人难忘的是一位松江老农，叫张金山，好几年住在五组收集草料下脚，他的一个儿子已经在外地上大学。老张见多识广，谈吐和别的农民不一样，常参与我们牛棚里的聊天。有时还从乡下带来一些土特产。有一年年底他从松江带来不少糯米，我从他那儿买了八十斤。老张心灵手巧，常用我们扎扫帚换下的竹篾编成小篮子。在牛棚干活，竹扫帚是重要的工具。洗牛身，掸牛身都需要顺手的扫帚，市场上供应的扫帚不好使，挤奶师傅们在工余时间把新扫帚拆了，再用铅丝重新扎成一把把轻巧实用的扫帚。换下的竹篾就被老张收集起来，扎成一个个小竹篮，分送给大家。有一次，我把家中一个专用于盛脏尿布的竹筐带到牛棚，被老张看到了，照着花样编了个送给我，还按了一个攀，做成小篮子的样子，方便使用。后来我用这小篮子盛了东西送到在老家南汇插队的妹妹那儿。当地农妇们看到了，说：“这不是尿布篮吗，怎么给按了个攀呢？”我这才知道，原来，在南汇乡下，竹篮的图案是很讲究的，不同用途的竹篮得用不同图案。真是各地都有自己的民风民俗啊，就连竹篮这么小的物件都有门道。

## 人牛情

顾师傅待牛很好，常说牛是大畜牲，通人性，和牛朝夕相处，人与牛也都有感情。受顾师傅的影响，我们五组对奶牛很友善。五组里的38头牛，虽然每头牛都有牛号，我们还是都给牛起了名字：那头上没角的叫“葫芦头”，乳头小的叫作“小奶头”，“小三

子”是指那头只有三个奶头泌乳的牛，那头背脊稍稍隆起的高大白花牛叫“曲背”，它是有名的种公牛“917”的妈妈，是头高产的良种乳牛。后来“曲背”的女儿也到了我们组，就叫它“小曲背”，尽管它的背一点也不曲，它的妈妈就改叫“老曲背”了。在我们这个牛棚里，牛和人就象家里人，“小三子，回来！”“葫芦头，过去点！”，“小曲背，不许再叫了！”（小曲背就是那头特别护犊的青年牛）。那些奶牛们似乎都听得懂，乖乖地顺从我们的吆喝。顺便说一下，奶牛只有在发情或护犊时才会叫，平日里是不叫的，即使在受了伤，以致于鲜血淋漓时也一声不吭，只有从那颤抖着的四腿可知它正在承受极大的疼痛。

天天与牛为伍，我喜欢观察牛，还爱逗牛玩，对牛的各部位太熟悉了，从牛角到牛尾，都能讲上一大通。先说牛角，人们总以为牛应该有牛角，尤其是在中国画中，画上大大的两个牛角，一看就是牛了，但那是水牛。而我们养的是奶牛，最不希望的就是大牛角。奶牛每天要到放牧场去三四个小时，运动晒太阳。在放牧场上奶牛会相互打架，最怕的就是它们因顶牛而受伤，尤其是怕伤及乳房。那时我们五组奶牛的角都生得好，要么牛角往下弯，要么双角弯成圆弧状，角尖向内，还有的干脆没有角，五组奶牛的牛角在打架时都没有杀伤力。在现代欧美的奶牛场里，奶牛一律是葫芦头，奶牛在刚出生后就在生角处点上药，从此再也生不出角了。

牛的眼睛非常美，尤其是小牛的眼睛，双眼皮，长长的眼睫毛，清澈的棕色眼珠。长方形的黑瞳孔。那时，我家七妹还在学校里念书，常到我工作的牛棚来玩，也喜欢看牛的眼睛。一次，堂侄女来我家玩，她是我家的下一代中第一个孩子，长得很美，七妹一看到她那大大的眼睛，就叫了起来“哎呀，她的眼睛美得就像小牛的眼睛一样啊！”妈妈听到后笑了：“哪有这样赞美人的眼睛的。”

牛的舌头结实有力，时不时地伸出嘴外，往左右两个大鼻孔里各掏一下。在给牛喂药时，把牛舌往外拉向一边，牛嘴闭合不上，乖乖地任我们把一罐药水倒入牛嘴中。牛鼻腔前那块大大的区域称作鼻镜，是牛的健康镜子。健康牛的鼻镜光亮湿润，上面布满点点的水珠。只有在牛生病时，鼻镜变得软绵干燥，失去光泽。我逗牛玩时，喜欢用手去拍拍牛的鼻镜，沾了满手水。奶牛不喜欢我碰它的鼻镜，无奈我和它们朝夕相处，只能晃晃大脑袋忍了。不过，牛似乎很乐意我抚摸它的脖子，它静静地卧在稻草上，眯着眼，嘴里不

停地反刍，大牛头随着咀嚼微微摇晃。那牛脖的皮毛油光铮亮，摸上去就像绸缎那样，我的抚摸令牛很受用。

坐在小板凳上挤奶时，眼前能看到的是那曲线优美的牛后腿和大大的牛肚子，还有牛肚下蜿蜒粗大的乳静脉，直径达两英寸多！据科学试验表明，每生产一公斤牛奶需要有500公斤血液流经乳房，一头高产奶牛日产牛奶可达六十多公斤，那就需要30吨血液流经乳房，全靠这么粗大的乳静脉来提供充分的血液。

由于新陈代谢旺盛，乳牛的正常体温高于人类，达39摄氏度，与通常“动物个体越大体温越低”的规律正相反。冬天的牛棚里总是暖烘烘的，就像装上暖气，那是牛棚里的38头奶牛的体温提高了室温。

相应地，奶牛的寿命比其他牛种短，一般牛的寿命可达30年，据说奶牛的平均寿命仅17年，上海牛奶公司的奶牛寿命更短，泌乳牛折旧率定在是八年，也就是说若乳牛泌乳八年就能收回投资成本，然而不少乳牛往往用不上八年就因病痛或低产被淘汰了。当挤奶工时，最不忍心的就是看到那些平日熟悉的奶牛被淘汰或死亡。

乳牛是人类培养出来的特殊物种，大部分的奶牛品种原本来自高纬度的欧洲地区，那儿夏天凉爽，而上海地区夏季闷热，奶牛度夏艰难，尤其是新产犊的奶牛。我们尽一切可能来防暑降温：牛棚里安装电风扇，食槽里放满水，太阳下山后才放牛到放牛场，等等。

奶牛的汗是红色的，炎热的夏天里，奶牛的黑白皮毛上染出淡淡的橙红色图案，那是被渗出汗水染的。在现在影视剧中经常看到所谓的“汗血宝马”，说是异常珍贵，这儿每一头乳牛都是“汗血乳牛”。

奶牛每天都需刨刷牛身两次，这能促进牛的血液循环。我刷牛身很认真，有一头牛似乎认识我，每当我刷到它时，它总是先伸个大懒腰，慢慢地把肚子鼓起来，似乎在配合我刨刷牛身，使我刨刷在圆圆的牛肚子上就顺利多了，真是很有趣。

刷牛身时我们离牛身很近，一不小心脚趾常会被牛蹄踩住。奶牛的四个牛蹄支撑了全身一吨多的重量，一旦被踩住，疼得拼命拍着牛腿，要它挪动。奶牛反应迟钝，等我拍了半天才慢吞吞地碾转牛蹄，挪动了一下，待拔出脚来，大脚趾已经受伤，趾甲下乌血一片，要等几个月新趾甲才长出来。在当挤奶工的八年里，我的大趾甲常常是黑的。但是，



我也不怨恨踩着我脚的奶牛，总是由于自己不小心才被牛踩到。我倒是希望奶牛有健康的牛蹄。

牛的尾巴与其硕大的体魄相当，又粗又长。在刷牛时，需要拉起牛尾，仔细地刷，特别是牛尾端常沾满了干的牛粪粒。牛尾的功能不少，在挤奶时我们得时时留意牛尾的动向，当牛尾慢慢撑起时，那是要拉屎了，若碰巧清洁工在附近，可用铲子接着，避免牛粪四溅。当牛尾唰地翘起，那是要拉尿了，得赶快站起来，护着奶桶，避免牛尿溅到奶桶里。

夏天蚊蝇多时，奶牛甩着牛尾驱赶蚊蝇。在它们身旁挤奶，常常会被牛尾甩到头上，甚至甩到眼上。在别的组里，有挤奶工知道哪头牛爱甩尾巴，在挤这头牛奶时，预先用绳子把牛尾绑在腿上。我们五组从来不绑牛尾，也从不无故打牛。

说到牛通人性，说一件趣事。五组的高产奶牛多，高产牛一天要产六十多公斤奶，我担心它们水份摄入不够，每天夜班下班前，还要提着水桶，依次给各高产牛喂水，天天如此，养成习惯。

一天夜班结束前，我提水去喂高产牛，同组的王师傅看到那头牛乖乖地把一桶水喝了，啧啧称奇。原来，那天他挤奶结束得早，见我还在挤奶，就代我去提水喂各高产牛，当水桶放在那头高产牛前，它别转牛头，对那桶水不理不睬。

我不知道王师傅已经喂过水，又去提水喂高产牛，那头高产牛见我提来的水，居然俯下牛头，乖乖地把我提来的一大桶水都喝了下去。当时我听了只觉得很好玩，如今回想起此事才意识到，那牛是认识我的。

事实上，岂止是一头，全牛棚 38 头牛都认识我。我从不折磨牛，若要母牛挪位，拍拍牛大腿，母牛就乖乖地挪动了。我唯一的一次打牛是实在不得已才动的粗。

上海的夏天炎热，母牛产犊后身体虚弱，但是不能让它长期卧着，否则会造成后腿麻痹。因此一定要强制母牛站立起来，最极端的方法是用铁架子夹着牛髌骨，通过挂在梁上的轱辘吊链吊起牛后身，强行使牛站立起来。有时奶牛太虚弱，一连几天都得吊牛，直到母牛恢复体力能自行站起为止。

这个法子很残酷，母牛髁骨周围的皮往往都被磨破，血肉模糊，只有在万不得已时才用，我们总是尽可能使新产母牛自行站起来，这时就只能抽打牛，强迫它站立起来，实在打不起来时，才用铁夹子吊牛。

一般都是由别的师傅去抽打牛，那一次偏偏轮到我要去挤那头产后久卧不起的母牛，我学着师傅的样去抽牛，要它站起来。没抽几下，那母牛挣扎着，但是实在太虚弱了，后腿无力，站不起来，它撑起前腿，扭过大大的牛头看着我，那哀怨的眼光令我再也打不下去，我丢下牛绳子躲开了，让别的师傅来抽打。

我以前见过别人抽打牛的情形，那些牛都是牛头向前，伸长着脖子要站立起来，而这头牛却扭过头固执地看着我，至今还记得那母牛的神情。我想它一定是认识我，一定是在奇怪我那时怎么变得如此残忍。

如今的社会上兴起养宠物，狗啊，猫啊，养得比人还娇气，宠得比自己亲生孩子还过分。人们谈起自己的宠物，往往眉飞色舞，似乎能与宠物交流沟通。我回想起八年的养牛经历，想起那些人牛情，当年那 38 头牛就是我的大宠物。我爱动物，但是不敢养宠物，怕一旦失去宠物，自己感情上受不了。



我在放牛场上和牛合影（1971 年）

## 牛与鬼

自古以来，提起牛，大都是褒义的，例如：“孺子牛”，“做牛做马”，“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等等。然而，在50年前的中国，“牛”可不是好字。如今五六十岁以上的中国人对“牛鬼蛇神”这四个字都不陌生。

1966年夏，伟大领袖就是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为号召，开始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国人被分为“红五类，黑六类”各阶层。黑六类指的是“地富反坏右资”，都是“牛鬼蛇神”，是“横扫”的对象。情节严重的还要关押起来，进行“隔离审查”，关押“牛鬼蛇神”的地方俗称“牛棚”，由根正苗红的红五类看管。

1968年夏，文化大革命深入开展，清理复查运动如火如荼，挖出了更多的牛鬼蛇神，几乎每个单位都设立了关押牛鬼蛇神的牛棚。

正当“牛棚”遍布神州大地时，我进了正真的牛棚，在那里与牛为伍，养牛挤奶。牧场工人成天在牛棚里工作，对“牛棚”一词当然毫无忌惮，日常交谈中也都是“牛棚长，牛棚短”的。

一次有位女工生病无法上班，要通知同一生产组中的其他工人，便打电话到附近的传呼电话站：“请叫对面牛棚里的人出来听电话。”那位接电话的大妈阶级立场坚定，马上回答：“牛棚里的？怎么能出来？！”可见当时对牛棚的阶级观念深入人心。

我进五组牛棚当挤奶工的第一天，在开工前要进行一个重要的朝拜仪式：向伟大领袖请示！那是紧跟当时全中国“早请示晚汇报”的潮流。在牛棚东西两侧大门的内墙上，高高挂着伟大领袖的宝像。

我和几位工人在东侧的伟大领袖像下前排成一排，仪式开始了，我们面朝东方，大声朗读几段伟大领袖的语录，接着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等表忠心的革命歌曲，仪式延续了十来分钟。

在此期间，那牛棚里三十八头奶牛表现得非常反动，有的不停地晃着硕大的牛头，拴着牛头的牛绳牵动了系在牛架的铁环，丁丁当地敲打着铁架，有的呼呼地喷着鼻，把

牛脚都伸进食槽里，有的牛更急切，使劲上下地甩着牛头，把口水吐沫甩得远远的，焦急地等这朝拜仪式结束，可以享用盼望已久的美餐。

而在西侧的毛主席像下，低头站着两个人，他们是以前私营牧场的资本家，属牛鬼蛇神，在我们朝拜过程中，他们始终静静地低头站着，在向伟大领袖像低头请罪，态度极其端正。这朝拜仪式令我很不自在，我的父母当时也是“牛鬼蛇神”，看到这两位“牛鬼蛇神”低头请罪，就想起父母在他们的单位里经受着种种羞辱。

“早请示，晚汇报”的朝拜仪式每天每潮都得进行，以表示对伟大领袖的忠心。直到一九六九年，伟大领袖又发出了“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号召。各工业部门派出大大小小的工宣队，进驻各部门。

牛奶公司不幸属农业部门，也属于被领导的“一切”。我们十二牧场来了一队工宣队。这工宣队来到牧场究竟干了些什么，现在大都记不得了，只记得一件事：他们发现伟大领袖的宝像居然挂在牛棚里，那还了得！！一声令下，“将伟大领袖的宝像请出牛棚！”在他们看来，这奶牛棚和那关押“牛鬼蛇神”的牛棚都是牛棚。是“专政对象”待的地方。伟大领袖怎么能待在牛棚里？

没有了牛棚里的伟大领袖像，那早请示晚汇报的膜拜仪式自然无法继续了。最高兴的应该是那些奶牛，那两位“牛鬼蛇神”也解脱了，不必每天低头认罪。只是挤奶工人对工宣队这一“革命行动”不以为然，伟大领袖的像不准挂在牛棚里，那我们成天在牛棚里工作的工人阶级也都是“牛鬼”了？也成了专政对象了？

“牛鬼蛇神”之一的朱宝仁也参与我们的聊天：“我们是生产单位，奶牛就是生产工具，牛棚就像工厂里的车间，牛棚里挂上伟大领袖像与在车间里挂伟大领袖像是一样的。”我很佩服他的超脱，他并没有为每天的低头认罪而感到羞耻，或许，在那每天的早请示晚汇报的朝拜中，他低着头，听那昂扬的“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歌声，伴随着奶牛们焦躁急切地折腾出各种噪声，还生出娱乐感来。

说起十二牧场中的牛鬼蛇神，我们五组里的两位牛鬼蛇神不过是私营牧场的资本家。在1956年前，他们有了些钱，投资乳业，到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公私合营）时，便要划分阶级，倘若资产结算超过3千元，就划成资本家，小于3000元大于1000元，就

算是小业主。一头奶牛值2千多元，若拥有两三头牛，就是资本家了，到了文化大革命时，资本家便都成了牛鬼。

比起这些牛棚老板的牛鬼，运输队里的牛鬼要复杂得多。运输队成员里大多来自苏北，有的是逃荒来到上海，有的是躲避当地土改的逃亡地主，有的甚至是有血债的。他们无钱无手艺，在上海没有生计，流落到牛棚，求给口饭吃。牛棚老板看着他们可怜，便留下做些粗活，割草搬东西，公私合营时这些人都成了牧场职工。文革期间揭开他们的来历，还真让人吓了一跳。听说其中有一人还曾吃过人心，他吹嘘当年吃人心的经过，说将人心扔到油锅里炸时，那人心居然飞了出来！

在牛棚里挤奶，尤其在晚潮夜深牛静时，牛吃饱后卧着反刍，只有挤奶工还在挤奶，我们手里忙着，有时就开始讲故事，讲天南地北，各种乡野故事。

讲到私营牧场时，挤奶工人有时也摆阔，挤完奶收工后，换洗得体体面面的，叫辆三轮车，坐车到徐家汇去看绍兴戏；讲到通购通销时，有工人偷牛棚里的精饲料，因为他在农村的家里断粮，都快饿死人了，急需粮食救急，后来他偷精料时被发现，成一大罪状；讲到在清队复查时，离牛棚不远的沪杭铁路上经常有人在那儿卧轨自杀，在牛棚里一旦听到那火车凄厉的鸣笛声，便知道又有人卧轨了。

牛棚附近有一年轻人，因“乱搞男女关系”被打成“坏分子”，一时想不开，跑到铁路上卧轨自杀，但是自杀未成，被火车齐齐地碾去了两腿。失去双腿的“坏分子”就住在附近，常见他双手撑地在地上挪动，令人感到可怜。

听到这儿，我说：“太惨了，他大概后悔还不如当初干脆被火车碾死。”朱宝仁说：“那不一定，说不定他在庆幸当年幸亏没被火车碾死。”朱宝仁的话常常很有哲理，他的女儿是我哥哥的同班同学。

另一位“牛鬼蛇神”王秋生也是个能讲故事的人，讲起他在某一天看到从马路对面的农科院里出来一群人，走到漕溪路上，其中有一位老者被打得头破血流，盈红的鲜血从头顶上淌下，沿着额头流到脸上，滴在地上，后面的打手追上去，递给他毛巾，要他把血擦掉，老者不理，推开毛巾，依然抬头昂然向前走去，路上留下点点鲜血。那情景从此就留在我脑海里。

第一次听到林彪摔死的消息也是在挤奶时听顾师傅说的，那是在 1971 年 9 月下旬，我和顾师傅挤双档：两人隔着牛肚子挤同一头牛的奶，听到师傅在轻声叫我，我附下身，从牛肚子下望过去，他悄声对我说：“林彪跑了，摔死了。”我们互相对望着，惊讶得不敢说话。虽然我们五组没有告密者，平日里在牛棚挤奶时讲的话也登不得大红之堂，但是，有关那副统帅竟如此“永远健康”地摔死的消息实在太震撼，只能在牛肚子底下悄悄地传递。

在挤奶时还讲鬼故事。把牛与鬼连起来，是伟大领袖的一大创举。不过，西区的牛棚还真的与鬼有些联系。这儿原先是乱坟岗，因地价便宜，好几家牛棚都建在此地。王秋生讲起他年轻时，一天心血来潮，到牛棚旁的小河里摸鱼，河水不深，他光脚踩在泥泞的河床，歪歪咧咧向河中走去，突然脚下踩到一个个球状物，光溜溜的似电灯泡，再一想，啊呀，那是死人的骷髅头啊，吓得赶快返身从河里爬起来。河里居然有那么多骷髅，可以想像，当年乱坟岗中的死尸横陈的恐怖情景。

既为乱坟岗，孤鬼野魂自然就多。牛棚里的老工人们说，牧场刚建成时，不少人真的听到过鬼叫。那鬼叫总是发生在淫雨绵绵的黄昏，声音有点像小鸭子叫：“嘘——哩哩哩……”有人还绘声绘色地讲起他的经历：那天他和另一人（有名有姓）到牛棚外搬运青饲料，刚低头俯身，要把青饲料装到箩筐时，在朦胧的小雨中，传来一阵阵的“嘘——哩哩哩……”，两人心慌，又不敢说话，只是连连往地上“呸！呸！呸！”吐唾沫，待慌慌张张地装好青饲料，端起箩筐，赶快往牛棚里跑。

与当时“横扫牛鬼蛇神”的潮流正相反，牛棚里的人都相信牛能压邪，“牛棚”非但不是坏地方，而且是个辟邪驱鬼的场所，鬼是不敢进牛棚的！那时候，每当我到牛棚去上夜班，在漆黑的夜里独自走过小河旁和放牛场时，不由得想起那些鬼故事，心里怕怕的，加快脚步，直到进了牛棚，才放下心来，这里有 38 头牛压邪，什么大鬼小鬼都进不来！

## 高中生们

1968 年 7 月，我们被分配到十二牧场的 66 届高中生共 14 人，除一人之外，其余都毕业于上海市第五十一中学，那是当时全市仅有的三所试验“中学五年一贯制”的重点

中学，上一届（65届）高中毕业生的大学升学率高达90%多。1966年春，正当66届高中生忙于准备高考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高考制度被废弃，上大学的梦想破碎。在滞留学校两年后，终于要安置这批66届高中生了。当时的分配方向有：上海工矿，外地工矿，上海崇明农场，黄山茶林农场，黑龙江军垦农场。我们原分配去向是上海崇明农场，最终能被分配到牛奶公司十二牧场，实属侥幸。这儿地处市区，待遇和在上海工矿无异，相比起那些分配到崇明，黄山，黑龙江等地的同学，好得太多了。

十四位高中生们被安排到牧场各部门，除了当司机，木匠，金工，运输队外，大都分配在牛棚当挤奶工。然而，一旦尘埃落定，每天从事单调繁重的体力劳动，高中生们并不甘于命运的安排，于是就各显神通，千方百计地尝试着改变自己的处境。

在那个革命的年月里，改变处境最佳捷径是走官场之路，首先要积极申请入党，那就会被组织认为是自己人，而且在各政治运动中紧跟大方向，表现得越左越革命，收效就越快。

在牛棚里的挤奶工L同志，不久就被抽调去内查外调。那时正值清理复查运动，急需抽调人员专门办理清理复查，查看档案，出差外调，等等，忙的不亦乐乎。“内查外调”成了个专门的职业：“皮包拎拎，外地兜兜”，那是很吃香的。当然，如今任何人的履历上都不会写上这段经历。

在那动乱年代，L同志以整人起家，又深通为官之道，红色权术娴熟，官运亨通，终于飞黄腾达，升到牛奶公司的管理层。另一位H兄开始也是挤奶工，被调去看牛棚，专门看管牛鬼蛇神，不过他终究还是心慈手软，对牛鬼蛇神不够狠毒，在官场上没什么前途，文革之后，考上大学，成了一名医生。

可见，这官场之路不是人人都走得通的。大部分高中毕业生们还得待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安排到一组牛棚里当挤奶工的那位66届毕业生，对奶牛的凶狠是出了名的。

可能是这位仁兄深感屈才，把一肚子的委屈全发泄在奶牛身上。倘若刷牛身时被牛挤一下，那还了得，就下死命地打牛，他似乎从虐待奶牛中找到乐趣，甚至还准备了打牛

的专用小凳子。奶牛特别怕他，轮到他上前来挤奶，都站在那儿一动也不敢动，双腿怕得渐渐发抖。一次他被牛尾甩到头，居然用手握住牛尾两部分，硬是生生地把那牛尾骨折断。

大凡是欺凌弱小者必定趋炎附势，他虽然对牛凶残，却是很能拍领导马屁，通过下棋与掌实权的 Z 领导套近乎，紧跟着 Z 领导叫嚷着“宁长社会主义的草，不长资本主义的苗”。1974 年他被选拔到江苏农学院去上大学，即“工农兵大学生”。

顾师傅肝炎病愈后调到与他同一生产组里工作，对这位仁兄虐待奶牛非常反感，顾师傅对我说：“这样一个对奶牛没丝毫感情的人，怎么偏偏会被选拔去深造畜牧业？”1978 年他大学毕业回到牛奶公司时，正值我们大部分 66 届高中生在高考后离开牛奶公司。1980 年他公派到美国进行奶牛生产实习考察时，被大型收割机轧断大腿，或许真是：“残忍是要遭报应的。”

当然，并不是人人都能趋炎附势溜须拍马的，那需要出卖自己人格。为官之道更不是常人都能走得通，只有少数识时务的俊杰们手段高超，才能官运亨通。大多数的平民都是老实本分，若没有形势变动，是无法改变自己处境的，只能等待。

不少 66 届高中生依然在工余之际坚持学习。虽然那时大学的大门紧闭，得靠选拔才进得去，但是我们还是傻傻地相信社会发展需要知识，总有一天会有转机，机会是眷顾有准备的人，更何况我们已经学到高中毕业，离大学深造只有一步之遥！

Y 君是世家子弟，绰号“鸭蛋”。早在学校时就听说他特别聪明，尤其是在英语和数学上的功课非常好。有趣的是他还能左右开弓，写两手好字。有一次上课时，他到黑板上演算题时，举起左手在黑板上写开了。在中国左撇子很少见。坐在下面一些同学开始发笑，听到笑声，鸭蛋意识到不对，赶快换成右手继续写下去，这下可真的引来了哄堂大笑。

鸭蛋来到十二牧场，因人长得高，被分配到运输队。在牧场里，挤奶工算是不错的工种，以前在私营牧场里，大都是牧场主的亲戚们（又称从业人员）当挤奶工，这工作有手艺有技术，牛棚里冬暖夏凉，而且双手常年与热水和牛奶打交道，总是软软的。

运输队的工作就不同了，风里来雨里去，开着三轮拖拉机，到各牛棚送饲料，是重体力劳动。那时十二牧场运输队里大都来自苏北的老大粗，解放前或逃荒要饭，或躲避土改逃到上海，他们无钱无文化无手艺，只能在私营牧场里干些粗活糊口。



文革期间从运输队里揪出不少牛鬼蛇神，每逢过年过节，牛鬼蛇神必须写认罪书。但是，运输队里的“牛鬼们”都是文盲，写认罪书的差事就都落在高中生鸭蛋身上。他当然不愿意写，领导就做他的思想工作，一定得写。每逢节日前，鸭蛋都要写上四五篇认罪书，还妙笔生花，变着花样，每一篇都写得不一样。

鸭蛋的英语水平远超其他同学。在运输队工作时，继续坚持读英文报刊，那时外文报刊杂志稀少，但是还能买到英文版的北京周报，用字典纸印刷的薄薄一本，便于携带，鸭蛋常常随身带一本北京周报，利用给牛棚送饲料的空隙就读上几页。

更绝妙的是他自学高等数学的方法：高等数学的教科书太厚，无法带在身边，就把教科书一页页撕下，每次带上两三页，一有空闲就学习。我常见他躲在五组南面草料棚的稻草堆里看书，很佩服他，也不想打搅他学习的兴致。直到1977年我们一起准备参加77届高考时，他才说出当年自学高等数学的妙法。

运输队的工作不但繁重而且没规律，吃饭不定时，经常得饿着肚子干活，干了几年强体力劳动后，鸭蛋患上胃溃疡，经常胃出血，只能干些轻工作。1971年秋，伟大领袖发出“全国学解放军”的号召，全国工矿企业都要进行野营拉练。第十二牧场也必须组织人力去“拉练”。

但是，牧场里的奶牛每天要吃料要泌奶，是不能停工的，这里每个工作岗位都是“一个萝卜一个坑”，都要有劳力顶着。只能抽调做轻工作的半病号去凑数“拉练”。鸭蛋不幸被征召“拉练”，尽管鸭蛋向领导再三解释他的身体状况，他还是得去！

在拉练途中鸭蛋发生急性胃穿孔，辗转送到中山医院，腹腔穿刺检查发现面里全是脓，病情已经发展成腹膜炎，幸亏及时手术，切除了五分之四的胃，才捡回一条命。病愈后的鸭蛋回牧场上班，担任食堂管理员，再也没见他在工余时看书。午休时鸭蛋与运输队的老大粗们打牌，和他们一起大吼大叫，常常争得脸红耳赤。

1977年恢复高考，鸭蛋以高分考进华东师大数学系，他的数学水平已远远超过其他本科同学，华师大将他与另外类似情况的五位同学另立一班，开小灶上课。两年后，鸭蛋留学美国，学成后在美国大学里担任教授。

文革期间到处宣传的是“知识越多越反动”，读书看报都可能受到告密指控。鸭蛋在工余时读英文报刊学高等数学，很幸运没被告密。在另一牛棚里当挤奶工的66届高中生刘君就没那么幸运了。

刘君文笔极好，工余时间总是手不释卷地在看书。但是他的师傅对他工作态度很不满意，就向牧场领导告密，说他不安心在牛棚工作，在宿舍里看水浒。于是，牧场领导在全场大会上批评：“有人居然在宿舍看黄色小说‘水浒’！”。当时没有点刘君的名，算是很客气的了。

那天开完会，我们回到五组牛棚里干活，沈师傅叹道：“唉呀呀，现在居然还有人在看什么‘三乎’啊！”。上海话“水”与“四”发音相似。沈师傅故意把“水浒”说成“三乎”，大家听了会心一笑，知道沈师傅在装傻。水浒是中国老百姓家喻户晓的小说，如今也居然成了黄色小说，成了禁书！

后来，刘君以他出色的写作才能写出一本小说：《英王陈玉成》，还被调到上海市里的写作班，终于能跳出牛棚，远离他那爱告密的师傅。改革开放后，《英王陈玉成》还被编成连环画出版。刘君1977年考入复旦大学历史系。1991年起移居澳大利亚。

1977年12月高考恢复，当初分配进12牧场工作的十四位66届高中生中，有十位参加了高考，全部考上了大学，至今有九位定居海外。

## 工余时间

我对自己能被分配到十二牧场当挤奶工，深感庆幸。我出身资产阶级家庭，而且还不是团员，在第51中学里属于出身“黑六类”的那一小撮，分配时没被派往崇明农场，已经是很幸运了！

在五组挤奶，渐渐习惯了繁重的劳作，组里的师傅们都待我好，他们的儿女们年龄与我相仿。五组离我家很近，骑自行车十几分钟就到，每潮工作结束后，就能骑车回家。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我有了一间独立的宿舍！1966年文革开始后，我家住房紧缩，一家祖孙三代10口人挤住在两大一小的房间里，现在我能有一间宿舍，真是太幸运了！我的宿舍在惠民牧场的民居二楼的西北间。朝西的窗口视野开阔，从窗口望出去，可以看到放牛场，小河，一大片蔬菜地，还能看到远处漕溪路上来来往往的车辆。

不仅是我，我们全家都喜欢这地方，家中每个人都来过惠民牛棚。1970年牛棚西边造了个小锅炉房，提供养牛挤奶所需的热水，这样就不用跑到西区分场去拉热水。锅炉房旁还造了个澡房，每潮收工后我们都能洗澡了。过年过节，我妈妈和妹妹们都来牛棚的澡房里洗澡。

那时候，我家七妹快要上初中，眼睛已深度近视，全家人都深为忧虑，要她照着当时的一个土方法来练眼睛。七妹每天下课后从学校走到牧场，在我宿舍里戴着奶奶的老花眼镜，从西窗向远处遥望半小时。待我挤奶下班后，骑自行车带上她，姐妹俩一起回家。

就是因为这段时期七妹每天到牛奶棚练眼睛的缘故，她眼睛的近视从此稳定，近视度数再也没有加深过。七妹上中学后，不能再每天到惠民牛棚来。不过，每当我告诉她有母牛生了小牛，她总是趁小牛还在五组时期，赶到牛棚来看小牛。

这间独立宿舍，给我看书学习提供了极大方便。虽然五组的上班时间比其他生产组长，还是有大量业余时间可以学习看书。在此期间，我读了许多世界名著的中译本，这些书早在1964年就被冠以“宣传资产阶级个人奋斗”从学校图书馆下架，封存起来。

在文革开始的两年，不少学生将封存在图书馆里的世界名著偷出来，在朋友之中传阅。这种传阅方式，最重要的是得守信用，说好何时还书，就一定得还，否则，就没有下一本书了。有时送来书的借期很短，得限时归还。

几十年之后才知道，我校男生也干过这“窃书不算偷”的营生。不过我不在他们传阅的圈子里。第五十一中学的学生们平日表面上都表现得很“左”，不敢与他们交往过密。是哥哥的同学们给我送来不少好书。

在那文化枯竭，思想饥渴的年代，这些送来的书就象旱天里的甘露。我这才知道巴尔扎克，雨果，迪更斯等名作者，浏览了他们的著作。记得我曾彻夜不眠，一晚上在牛棚

的宿舍里看完“飘”的第一部。读“简爱”时更是如醉如痴。后来上大学时，熄灯后和同宿舍的同学们聊起“简爱”，还能把书中的许多情节详细地背出来。

令我至今难忘的是那本《第七个十字架》，讲的是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通过七个逃犯的不同经历，把当时社会的缩影淋漓尽致地描绘出来，那情景与当时文革的红色恐怖非常相似。

现在回想起来，也幸亏了那十年的牛棚，有机会浏览了很多世界经典名著的中译本，到了改革开放后，进了大学，又开始了在学业上发奋，虽然这时文化已解禁，七妹买了大量的经典著作，可是我已没有以往那种如饥似渴的干劲和时间去阅读这些闲书了。

除了看闲书，我在牛棚的大部分业余时间都在自学电子技术。在文革年代，尽管当局关闭了大学，宣扬“知识越多越反动”等等谬论，先进的科学技术还是通过各种渠道点点滴滴地渗进了中国。

上海工厂里有不少技术革命或技术革新小组，尝试着将新型的电子技术应用到生产上，因为是工人的土法试制成功，当时的报刊也经常报道此类消息，“可控硅”，“程序控制”“线性切割”等等字眼经常见报。相应地，各区工人文化馆，科技馆纷纷开办电子讲座。

大学关了门，大学教师们无课可上，纷纷走出校门，参与工人的技术革新小组，或到各电子讲座里讲课。上海的大工厂里的技校也改名为“七二一”工人大学。我大哥学的是无线电专业，当时在单位里试制电子秤，后来到南市区工人文化馆开讲电子技术课，我和妹妹们都去听他讲课，这些在业余时间听的技术课令我们姐妹们在日后参加高考时受益非浅。

我到处找机会去听电子讲座，南市区，徐汇区，长宁区，都去过。有的讲座甚至提供实验。报名听课很容易，只要单位开一张介绍信即可，第12牧场领导只要不影响上班，都提供方便。

上课一般都按排在下午，为了去听课，我一直上早夜班，就是做早潮和晚潮，留出下午时间去上课。一般来说，牛棚的三潮两班，大部分人都希望能做早潮和中潮，即常日

班，我曾连续做了两年的早夜班。这也使他人有更多机会做常日班。我在试制金属探测仪时，这些自学的电子技术帮了很大的忙。

除了电子技术，我花了很多时间学医。学医很实用，每个人都应该懂一些医药知识，自己的身体健康，亲友们的病例，都是实践的机会。那时候，大学虽然关了门，在福州路旧书店可以买到医学医的教材。我读过不少医学院教科书。那期间，我的时间安排得很紧，列了一表格，把工余时间排成课程表那样。每一小时都有所安排，学一小时电子技术，再学一小时医药书。用那张表格监督自己，不浪费时光，不致于将大好青春年华在挤奶养牛的单调劳作中流逝。

叶秋怡

2016年10月初稿

2020年8月定稿

纽约上州

# 牧场岁月（下篇）

## -牛棚里的科学

### 五组的奶牛高产经验

早在我来到十二牧场之前，五组就已经是奶牛高产组，在 1966 年至 1976 年那段时间，牛奶公司的奶牛每年产奶的平均产量在 5000 公斤左右，而五组的奶牛年单产总是达到 7000 公斤以上。

五组的高产首先应归功于组长顾根余师傅。在他的带领下，五组对奶牛的饲养管理认真细致，在现有的饲料基础上，合理搭配精料粗料，并且区别对待处于不同生理期的奶牛，把高产奶牛与普通奶牛区分开来，把泌乳牛与新产牛区分开来，在新产牛产后适时催奶，对高产奶牛实行双档挤奶，奶牛怀孕 8 个月后及时断奶，以保证健康顺利地产犊。

简而言之，五组的养牛经，就像农民种地的“精耕细作”那样，科学细致地养牛。诚然，五组的高产牛比例比较高，牧场的技术人员经常分配一些高产牛的后代给五组。但是在同样的饲料条件下，科学细致的饲养管理确实可以使奶牛的年单产提高 1000 公斤左右。

在那只注重政治的年代里，奶牛高产给牧场工人带不来任何实惠和好处。牧场工人的工作量是以奶牛的头数来安排的，若是奶牛产量低，工作时间就短，那倒是很大的实惠。不少生产组里的工人上班时匆匆忙忙，马虎了事，奶产量越低就越早挤完奶收工，哪里还管什么区别对待和科学养牛。许多女工都不愿到五组来工作，说五组的工作时间太长，那里的牛奶多得好像怎么都挤不完。

在这种大环境下，顾师傅依然能够凭着自己的良心工作，认真负责地养牛挤奶，更可贵的是他以身作则，带领着整个生产组，形成认真操作，爱护奶牛，科学养牛的风气。1972 年顾师傅调离五组，我接任五组组长，继续维持了这样的工作风气。

我敬佩顾师傅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和善待奶牛的情感，还在当学徒时就利用工作之余把五组的高产养牛经验总结出来。先在十二牧场总部召开的全场大会上报告了五组的高产养牛经验，后来又在 1971 年公司技术大会上再次报告这个养牛经，简称为“五组经验”。

公司技术大会之后，有人来到五组，帮我修改“五组经验”的稿子，他在我的原稿上逐字逐句地修改，待我看到那原稿上密密麻麻地一片红色，感到无奈和可笑，他不懂养牛，不敢修改任何关键的内容，却偏偏在表达方法上逐字逐句地计较。后来我出国留学，从事高科技的开发，每当审阅或修改他人文章时，常常想起自己当年的那份被改得一片红色的原稿，便告诫自己要尊重作者，要接受作者的表达方式，只要内容正确即可。

1972 年，有一个解放军写作班进驻我们牛棚，一共四人，专门来为五组经验写文章。他们住在五组民居二楼的东面大卧室里，偶尔和我们谈话，但是从来不进牛棚。

我很奇怪：解放军怎么会来写五组经验？回答说：他们是在上海市委提供的几个课题中挑选了“五组经验”。解放军写作班在五组驻扎了近一个月，可能对自己的成果并不满意，最终写出的文章没给我们看。

他们对我坦白地承认，若再在五组住下去，都不好意思到食堂吃饭了。是啊，每天我们忙碌地养牛挤奶。而四位年轻的大小伙子，在楼上摇着笔杆子闭门造车，折腾了这么久，就为写“五组经验”那一篇文章，难怪要不好意思了。

1973 年女工袁英巧从东区调来五组，担任副组长。1975 年夏我调任十二牧场厂医，袁英巧当上五组组长。1979 年，她成为全国劳动模范，是那年上海仅有的八位全国劳模中的一员，很是风光。

此时我已经过 1977 年的高考，进入大学里读书。抽空到袁英巧家去探望，看到了那枚全国劳模的金质大奖章，沉甸甸的闪着金光。显然，袁英巧的荣誉来自五组高产奶牛经验和科学养牛的风气。

现在从网站百度上可以搜索到关于袁英巧的介绍，其中有关五组经验的语句：“饲养管理讲科学，精粗搭配区别喂，配合繁殖工作好，产后催奶适时机、操作制度不走样，

高产双档挤奶好。”大概就是来自那队解放军写作组的文字。可惜，袁英巧不到五十岁就因患癌症逝世。

## 畜牧情愫

我在五组养牛挤奶，正值渴望学习追求知识的青春年华，对畜牧业也感兴趣。早在学徒期间就把五组的养牛经验总结成文，从此开启“五组经验”的成名之路。在当时分配到牛奶公司的66届高中生中，我大概是唯一的写出养牛经的一位了。听说在牛奶公司的共青团大会上还曾把我作为“养牛为荣，挤奶为乐”的典型，然而，我不是共青团员。

在这之后的一天，12牧场66届的三位团员同学一起来到宿舍与我谈话，要我与家庭划清界线，争取入团。此时的我，再也不是以前幼稚狂热的中学生。文革中我父母遭受种种迫害磨难，兄弟姐妹经历各种坎坷，我们全家紧抱在一起，相扶相持，熬过文革中阵阵腥风血雨。家庭对我来说是至关重要，所谓“与家庭划清界线”是何等地违背人性！

我不屑去虚伪地“争取进步”，便明确回答他们：“所谓的‘与家庭划清界线’是不可能的，人怎么能和自己的家庭分开？”他们又弹起“要放下家庭出身的包袱”的老调。我对此陈词老调早已反感至极，直接反驳回去：“我没有什么包袱，我好端端的一个人，怎么会自己看不起自己？有包袱的是你们，是你们看人时只看出身！”团员同学们无言以对。几天后，牧场的Z领导屈尊亲临五组牛棚，找我谈话，谈话的结果令他意识到我是无法染红的。

那时，我对畜牧业很感兴趣，幻想能当个畜牧师。我在五组认真养牛，利用业余时间试制金属探测仪和电脉冲针灸仪，即使当了厂医后还去参加牛群普查，并为建立奶牛档案而设计图章。牛奶公司畜牧科的丁丽娟老师曾来到12牧场，要调我去公司。

不料，那位Z领导立即表示反对，话说得很直接：只要他在，我就甭想离开牛棚！大凡有了权力的人，智商就会降低，真的以为自己成了上帝，能掌管他人的生杀大权，能把人卡死。Z领导的坚决反对，彻底了断我贡献畜牧业的念想。一年后，Z领导调离12牧，不久，我调任12牧场医。在当年分配到12牧场的66届高中生中，我是最后一位调离牛



棚。1977年高考恢复，我全力以赴，开始了人生新的一章，后来成了电子工程师。我与畜牧业终究是有情无缘。

不过，我依然喜欢看牛，在德国留学期间，我住在慕尼黑郊区的小村庄里，常到邻近牧场去买新鲜牛奶，顺便到牛棚里去看奶牛，闻闻那熟悉的牛棚气味，看看那些强壮的德国黄白花奶牛，还和牧场里的工人聊天。有一次遇到政府的乳品管理人员在牛棚里。牧场工人笑着对我说：“这是上面来检查呢！”那个牛棚生产的牛奶含脂率高达4.2%，远高于德国超市里的3.5%牛奶。

## 人工授精员

奶牛只有产犊后才能泌乳，故而奶牛受孕产犊是牛奶生产的关键。上海地区在上世纪50年代之前，奶牛受孕都是让公母牛在放牛场上自然交配。自1959年起牛奶公司废除自然交配，人工授精是唯一的奶牛繁殖方式。

人工授精员就是指专门从事给乳牛授精的技术人员。十二牧场有两位人工授精员：徐其林师傅负责西区，龚明奎师傅负责东区。他们每天骑着自行车来到牛棚巡视或工作，自行车上总是带着装冷冻精液的保温罐。清晨和傍晚，我们都还在休息时，他们在牛棚里或放牛场上巡视，观察母牛的分泌物，一旦发现即将排卵的迹象，就要及时授精。

那时采用的是直肠把握式宫颈深部输精法。比起原先采用的阴道开腔器输精法，这方法使母牛的受胎率提高10%。人工授精员在操作时，得先把右手臂伸入牛肛门，一把一把地把直肠里的牛粪掏出来，那一大坨一大坨的牛粪沿着手臂腋下涌出，啪啪地落在脚下，同时手臂慢慢地沿着直肠向体里推进，直到整条手臂几乎都伸入牛体内，才能通过直肠摸到母牛卵巢，从而检查卵巢上滤泡发育成熟情况，然后才能有效地授精。

即使在寒冬腊月，他们也得光着右膀操作。所以人工授精员工作服的右袖可以完全脱卸，以方便操作。相比起这样紧贴着牛屁股在牛粪堆里进行的操作，挤奶工的工作要干净轻松的多，挤奶工只需要躲避奶牛的拉屎拉尿，偶尔才溅到些牛粪牛尿。

畜牧业是生命科学的先驱，那时，中国科学院生物研究所曾与牛奶公司一起合作搞课题。中科院的科学家们原先都是在象牙塔里看文献搞研究，在干净舒适的实验室里

做实验。在合作期间，龚明奎师傅去生物研究所实验室讨论课题，当龚师傅凑近显微镜观察时，闻到一股强烈的香味，原来那显微镜的镜头都被那位女研究员身上的香水熏香了。

作为合作课题的一部分，中科院的研究员们来到牛棚里，向人工授精员学习直肠把握法，学习如何把手臂伸进牛肛门里往外掏牛粪，可想而知，这种冲击对平日养尊处优的他们何其巨大！下班后，人工授精员们把手臂稍稍冲洗，就若无其事地去吃饭聊天了。而科学家们掏牛粪后引起的恶心反胃，好几天都吃不下饭，过了好久才恢复过来。



2016 年秋回国探亲，与牧场的技术人员们合影。左起：我，丁丽娟，徐其林，龚明奎

文革期间，虽然上层建筑的单位搞乱了，但上海的各生产单位依然照常运作，当时的口号是“抓革命，促生产”，上级领导制定生产指标，层层监督，基层单位一定得认真执行，惟恐被扣上“破坏生产”的政治大帽子。

人工授精员的生产指标就是奶牛繁殖率。那时候牛奶公司定的繁殖率指标高达 85%，换句话说，平均每头奶牛每 14 个月就得怀一次胎。繁殖率与牛奶产量有紧密联系。奶牛产犊后就是泌乳高峰，随后泌乳量日渐减少。故而繁殖率越高，牛奶产量就越高，但是太高的繁殖率很伤害奶牛健康从而缩短寿命。2016 年我回沪探望龚师傅，得知如今的奶牛繁殖率指标已调整到 60% 以下了。

当年为了完成这 85%繁殖率的指标，人工授精员不仅要有高超的技术，而且劳动强度非常大，远超过我们挤奶工。在配种高峰期，龚师傅徐师傅奔忙在各牛棚里，大腿因长期骑自行车都磨得起泡破皮。他们属于技术科干部，粮食定量仅每月 29 斤，常年累月地吃不饱，龚师傅至今还记得当年那种难熬的饥饿感。

虽然工作很辛苦，两位人工授精员非常热爱他们的工作，风里来雨里去在各牛棚里忙碌。我很敬佩他们。我们五组的高产母牛多，工人又都爱护奶牛，徐其林师傅与我们很谈得来。他平时说话不多，但是一提起良种母牛就有一种由衷的痴迷，会如数家珍地讲起良种母牛的血统，奶产量，体型特征等等。即使是对小母牛，徐师傅也爱护备至。

记得有一次运输队来五组，要把小牛犊送到小牛组去，那位老大粗抓住小牛尾巴，就要往车上拖，徐师傅看见，赶快阻止：“不能抓小牛尾巴，那是很嫩的，你这样抓会弄断尾巴的！要抱着小牛四条腿送到车上去！”

基于如此的“行业乐在其中”的敬业态度，两位人工授精师傅的配种技术精湛完美。改革开放初期，有位美国农场主到中国考察，得知龚明奎师傅给奶牛的配种成功率高达 75%，而美国最好的配种成功率也只不过 60%左右。这数字上的 15%差异意味着经济效益上的巨大差异。那位美国农场主当即邀请明奎师傅到美国他的农场去工作，一开价就是每月工资 8000 美金，还承诺向他提供一幢房子和汽车。当时国门初开，明奎师傅考虑到自己语言不通，家中有三个孩子，没有接受邀请，淡淡一笑而过。

## 乳牛育种和本土化

中国人的传统不喝牛奶，荷兰黑白花乳牛是外来物种，是欧洲人经过了几百年时间的技术积累才逐渐培养出的。上海开埠通商后，欧美洋人们把欧洲乳用牛运到上海，以得到新鲜牛奶的日常供应。

正是因为乳牛品种珍贵，那时洋人们严格禁止欧洲乳用牛种进入上海农村，黑白花乳牛产下的小牛都要严格登记，小母牛留养，小公牛宰杀。1890 年，一个偶然机会使得一头荷兰黑白花小公牛流落到川沙农村：那是某天的夜晚，外商“爱光社”牛奶公司的一

头黑白花母牛产下两头小公牛，当时在“爱光社”工作的一位中国员工灵机一动，只上报了一头小公牛，乘外国人睡觉的时候，他将另一头小公牛偷偷带出了牧场，转移到川沙的朋友家饲养，并用本地耕牛的奶来喂养。等它长大后，让其与本地黄牛进行杂交，从此开启了上海民族资本的奶牛业。

后来川沙地区的奶牛业尤为普遍。黑白花乳牛与上海本地黄牛的第一代杂交奶牛，又称“二夹种”，二夹种的后代称为“倒二夹”。我刚开始在五组挤奶时，牛棚的38头牛中还有几头奶牛是二夹种。由于杂交优势，这些“二夹种”性能不错。从1938年起至1950年，上海地区的奶牛行业多次从海外进口奶牛，其中以“黑白花奶牛”为主。1950年之后，停止从欧美进口奶牛，直到1984年起才重新开始大规模从欧美进口良种奶牛。

上海地区的奶牛业发展，不仅要引进国外的良种奶牛和种公牛，还必须实现奶牛本地化。来自欧美的乳牛的原产地大都是高纬度地区，夏季凉爽。而上海地区的夏天极其闷热，气温可高达37度，奶牛的新陈代谢旺盛，体温高达39度，这些来自高纬度地区的奶牛如何安全度过上海的酷热，是一大挑战，故而上海地区迫切需要通过实现奶牛的本土化。

在1950年至1984年的三十多年期间，上海地区不再从欧美进口奶牛，奶牛育种主要依靠从本地优秀奶牛中筛选，育种采用的方法称为“级进杂交”法：从现有的几枝公牛族系的后裔中选出高产母牛，再从它们的女儿中挑选高产母牛，如此代代筛选，连续五代，将第五代的高产母牛与其上五代的公牛族系进行回交，以巩固其优良品性。所以在给奶牛配种时必须熟悉各枝公牛的后裔，以避免“爸爸配女儿”或“祖孙配”等的近亲交配。

至今我还能记起当年几头种公牛的牛号：《917号》和《310号》公牛。我们五组有好几头奶牛是他们的后代。310号公牛是1946年联合国救济总署《援华奶牛》的后裔。310公牛的女儿们体型都较矮，乳房端正，乳头偏小。917号公牛是五组奶牛“老曲背”的儿子，那是徐其林师傅建议留下的，记不得它属于上海奶牛哪一枝公牛的后裔。917的后代比较高大，有点像其母亲。1978年上海选育出325号是最优秀的公牛，其公牛族系来自八牧。八牧的人工授精员侯根福师傅到六牧场取冷冻精液时，总是追着要325号的种。

## 开发冷冻精液技术

乳牛品种优化的关键是培育良种公牛，常言道“母牛好好一窝，公牛好好一坡”。培育良种公牛的信息反馈周期漫长：母牛十月怀胎，产下的小母牛 18 个月后怀胎产犊泌乳，至少得等一个泌乳期之后才得知此母牛的泌乳能力，进而从牛群的产乳能力统计得出公牛品种的优劣，也就是说起码要花费四年多才能确定该种公牛是否优良。

液氮冷冻精液技术的开发大大提高乳牛育种的效率：从优秀母牛中筛选出留种母牛，把它们产下的小公牛长大后采精，将精液冷冻保存。先取小部分冷冻精液给一小批母牛授精，待产下的奶牛长大产奶后，统计这头种公牛后裔的产乳性能，从而挑选出良种公牛。有了冷冻精液技术，一头公牛的精液可供数十万次以上的配种，液氮的低温可以长期保存良种公牛的精液，从而不受公牛寿命的限制，也避免了将劣种公牛进行广泛配种而造成的经济损失。

自上世纪六十年代起，牛奶公司的公牛集中在三个牧场：六牧，二牧和十一牧。南片牧场（六牧，八牧，十牧，十二牧）的人工授精员们组成了冷冻精液试制的合作小组，（简称“南片合作组”），开始了冷冻精液技术的研究开发。

南片合作组的成员大多没有受到过正规农学院的教育，但是都有丰富的牧场经验和积极尝试的干劲，互相之间非常投缘，大家一起合作，群策群力，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技术成果。

六牧场的畜牧师孙尚德和八牧场兽医刘福强也积极支持南片合作小组的工作，他们两位都受过农学院高等教育，提供了很多有关冷冻精液技术的文献资料信息。

冷冻精液技术的开发经历了多次的突破：从自然交配到人工授精，从常温精液到冷冻精液，从采用干冰（-76C）作为冷源到用液氮（-196C）作冷源制作颗粒冷冻精液。每一个突破都付出了大量的精力：采精后如何配制精液，在制作冷冻精液时如何降温，在使用冷冻精液授精时如何升温，等等。

在那个年代，中国闭关锁国，不仅来自海外的技术信息有限，材料设备更是落后，每一个技术突破都需要多次的摸索，并在实践中反复验证，才攻克一个个难关。后来有关

报道中提及他们的成果时说：“1971年上海自行试制以液氮为冷源的颗粒冷冻精液成功。”只有亲身参与其中的人才能深切体会到这“自行”二字包含着多少执着和辛苦。

在试制早期，用干冰作为冷源的冷冻精液都无法授胎，原因是采用的干冰中酒精含量太高，把精子都杀死了。为了得到高质量的干冰，就设法讨好干冰厂的工人。龚师傅与足球运动员很熟，私下里送几张热门的足球赛票给制作干冰的工人，请他们在制作干冰时多过滤两次，以提高干冰的质量，终于解决了这一技术难关。

在试验用液氮做冷源的颗粒冷冻精液时，如何降温和升温精液是技术关键。南片合作组经过反复尝试后发现，降温公牛精液必须缓慢而且分阶段，先从38℃降到4℃，此过程往往需要几个小时，待精液彻底冷却后，用滴管将配制后的精液滴到干冰（-77℃）内，进而用液氮降到-196℃度。在人工授精前需要升温冷冻精液，这时得快速升温才能保证精子的成活力。

我因总结出五组奶牛高产的经验，有幸参加1971年牛奶公司技术交流会议，在会上听到南片合作组试制冷冻精液成功的报告。这才知道龚师傅徐师傅他们除了日常的人工授精操作外，还与南片牧场的同行们做成这么一件技术革命的大事，令人钦佩。六牧场离五组不远，骑自行车15分钟就到，我有时到六牧场去看公牛，也见到南片合作组的人工授精员们围在一起制作冷冻精液颗粒的情景。

自上世纪七十年代初起，牛奶公司开始筹建公牛站，决定将公牛站建在六牧场。公牛站的建设比造普通的牛奶棚不同，因为荷兰黑白花乳牛的公牛性情与母牛很不同，荷兰黑白花母牛的性情温顺，人可以安全地靠近乳牛操作。黑白花公牛个头很大，体重是母牛的两倍。力气也很大，饲养公牛要分外小心。

在六牧场曾发生过公牛伤人的事故。肇事的就是那头有名的《917号》公牛。那位饲养员长期与公牛打交道，已经与公牛很熟，那天在喂料时，一时大意，离公牛太近，不防备那《917》的大牛头一晃，牛角撞在饲养员胸口，一下就挑断了他所有肋骨，送到医院已不治身亡。伤心的亡者妻子想去看是哪头公牛肇的事，人工授精员们拦住她，怎么也不敢告诉她实情。

毕竟，《917》是头难得的良种公牛，当时那头公牛并没有发脾气，只是那么摆了摆头，就把人给弄死了。故而在建造公牛站时，公牛的牛栏都用粗大的钢管建成，上级主管部门在审批提供公牛站所需的钢管建筑材料时，感到很奇怪，造一个牛棚居然需要这么大批量的钢管？

1974年11月牛奶公司种公牛站建成，1975年起上海种公牛站进口法国设备，开始制作塑料细管液氮冷冻精液，从此开始了冷冻精液在上海地区甚至全国的奶牛群中的普遍应用。公牛站也“鸟枪换炮”，当年六牧场的简陋公牛棚都改建成现代化的设备，走进制作冷冻精液设备的厂房，走廊里一大排不锈钢大型液氮罐，锃亮发光。虽然早期制作冷冻精液颗粒的土方法已经成为历史，但是当年南片合作组敢于开拓群策群力的精神依然值得赞赏发扬。

## 牛群普查

培育出适应当地气候的高产良种乳牛是件大工程，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冷冻精液技术是关键，数据的积累和统计避免了育种的盲目性，筛选出留种母牛更是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牛奶公司自1974年至1992年间每年进行一次牛群普查鉴定。1975年我调任十二牧场的厂医，虽然厂医工作干净轻松，但是我却依然对奶牛育种感兴趣，“不务正业”地参与奶牛育种的工作，跟着龚师傅等参加1975年的牛群普查，跑遍了牛奶公司的各牧场，鉴定良种母牛。

良种母牛普查首先是根据奶牛的奶产量，选出一批高产母牛，然后组织技术人员到实地鉴定高产母牛，要求留种母牛体型好，牛脚牛蹄健壮，乳房端正，乳头适合机器挤奶，等等。从高产母牛中挑选出留种母牛，把它们产下的小公牛留种。记得1975年那次牛群普查，全牛奶公司的畜牧技术员和人工授精员都参加了，其中有一位女士：公司畜牧科的丁丽娟，十一牧场的畜牧技术员孟庆佩，还有我，只是个挤奶工，更准确地说，是个厂医，是跟去看热闹的。

我喜欢和这些畜牧和人工授精员们在一起看牛，尤其喜欢听龚师傅，徐师傅和侯根福师傅的聊天，他们敬业，真诚，正派。看牛期间，我们一起骑着自行车到郊区牧场去，一路上天南地北聊天，一两个小时的骑车，也不感到累。

徐师傅言语不多，但是特别爱看牛，一见到良种母牛，围着那牛上下左右地打量，几乎是着了迷。大家都笑他：“别人爱美女，徐师傅是爱美牛。”侯师傅是八牧场的人工授精员，我第一次见到侯师傅是在1971年的全公司技术交流大会上，他代表南片合作组作冷冻精液颗粒的报告，他绘声绘色的讲解令人印象深刻。

这次和他一起牛群普查，常常被他的风趣逗笑，任何场合只要侯师傅在，气氛就活跃多了。龚师傅豪爽豁达，谈吐幽默。记得当我们来到嘉定四牧场看牛时，当地技术员讲起嘉定的一位以前劳模，被打成“牛鬼蛇神”，他的一大罪状是和刘少奇合过影。龚师傅听了，冷冷一笑，反问道：“和刘少奇合影就成了罪状？那么谁与刘少奇合影最多呢？”大家想起文革前的国家领导人们的照片，都不吭声了。

参加牛群普查，我不仅看了很多高产母牛，也趁此机会见识了牛奶公司各牧场的特色。牛奶公司的十二个牧场可分为三大类：一类是我们第十二牧和浦东的第十一牧场，中国本地牧场主开设的牧场，即公私合营的牧场，三四十头小牛群，牛棚分散，手工挤奶。

另一类是美英式牧场，如第六牧场等，牧场规模稍大，挤奶器按装在各牛棚里，挤奶工提着挤奶器依次到各奶牛旁挤奶。

还有一类是当年中苏友好时期苏联专家来设计建立的大牧场，一牧，二牧，七牧等，是苏联式大牧场的翻版。占地辽阔，牛棚整齐，听说早先连奶牛的花色都相似，一律黄白色。挤奶集中在一大间机器挤奶房，在挤奶时段，一头头奶牛从各牛棚踱到挤奶房。在挤奶台上挤完奶，然后踱回各自牛棚，有的奶牛步伐艰难，真像被榨干了血汗的那样。挤奶用全封闭的挤奶器，无需顾虑弄脏牛奶，也不会发生牛脚踩进奶桶的事件了。

这几个现代大牧场虽然设备先进，可惜牛群的品种大多源自前苏联，经过二三十年的选种育种，牛群的品性还是不如南片牧场的小型牧场，在牛群普查时入选的高产母牛不多。



大型的国营牧场有奶牛产房，挤奶工不需兼职助产。在那里我还看到了完备的修牛蹄设备：粗大的木架，把牛夹得稳稳妥妥的，修牛脚的师傅可以舒舒坦坦地坐在小板凳上修牛脚，想起顾师傅徒手修牛蹄的惊险情景，很感慨，要是我们十二牧场能有这设备该多好。

在提高奶产量的各因素中，育种遗传因素占了70%绝对性的作用，而饲养管理、营养水平、牛舍饲养条件、兽医保健等其他各项因素占30%。图1列出了1956年至2006年上海列年奶牛平均单产，展示了上海地区奶牛业在过去五十多年内的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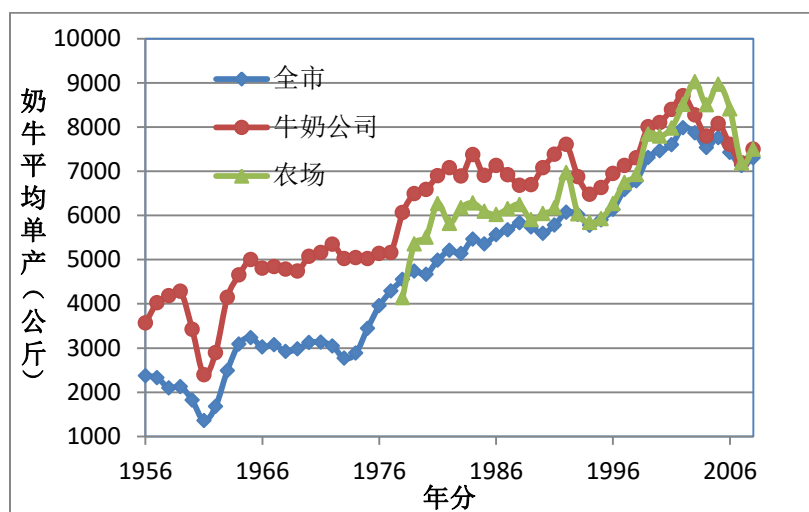


图1：1956年至2006年上海列年奶牛平均单产。（资料来自上海奶业简史）

图中1961年的低谷反映了那段三年自然灾害的饲料匮乏时期。1966年至1978年牛奶公司的奶牛平均单产在5000公斤左右徘徊。自1979年起奶牛的平均单产开始逐年攀升，在1978至1992年间达到7000公斤左右。这正反映了自70年代起冷冻精液技术的开发，公牛站的建立，奶牛普查和选育良种的多年积累的成果。1999年起奶牛单产再度攀升，其原因可能源于上海从海外引进了一批堪称全球一流的荷斯坦北美品系与德国品系奶牛种质。

我养牛挤奶8年，深知牛群的年平均单产达9000公斤是多么的不易，其中凝聚了多少奶业职工和技术人员的心血！

四十多年后，我在西班牙旅游时，沿途没见到奶牛场，西班牙的传统甜点不是乳制品，而是蛋挞-用鸡蛋做的甜点，因为西班牙气候炎热，不适宜乳牛业。回想起牛棚十年，上海夏天酷热，上海牛奶行业居然能够培养出了适应上海气候的良种奶牛，实在了不起！！

## 八牧兽医刘福强

和徐师傅和龚师傅交谈中，常常提起八牧场的兽医刘福强医生，他是治疗奶牛创伤性心包炎专家，闻名全牛奶公司。

奶牛创伤性心包炎是上海地区奶牛的常见病，上海是工业城市，来自上海郊区的草料常混有的铁丝等尖锐异物，倘若这些尖锐异物被奶牛吞食后，经过瘤胃后滞留在网胃（蜂巢胃），网胃离牛心脏很近，尖锐异物在牛运动或咳嗽时可能穿透胃壁、膈，刺到心包上而致病。患了心包炎的奶牛，奶产急剧下降，必须动手术把尖锐异物取出才能治愈，否则只能淘汰送屠宰场了。

奶牛创伤性心包炎的手术治疗难度很大，需要锯断肋骨打开胸腔，才能触及心包取出异物。刘医生是牛奶公司中少数几位能做此手术的兽医。一天，徐师傅告诉我，刘医生要来 12 牧场做心包炎手术，我骑车去那个牛棚看热闹，不敢靠近，只远远地观看。

手术设施简陋，空空荡荡的牛棚里，其他牛都已放到放牛场。只有那病牛站立着，它的前后腿都绑在牛架上，刘医生是主刀医生，四周围着龚师傅徐师傅和 12 牧场的兽医们。刘医生在牛右前胸划开 20cm 的口子，锯断肋骨，然后把手伸进刀口里探索，那牛开始挣扎，看到此，我感到反胃头晕，天旋地转，再也看不下去，只得赶快离开。

我进一步结识刘福强医生是源于金属探测仪。那时兽医设备简陋，诊断心包炎很困难。听徐其林师傅说，刘福强医生托人制作了一台金属探测仪，用于诊断心包炎。不过那个探测仪操作困难，有时耳机里还放出了样板戏。

我一听就来了劲，“能播送样板戏”？那说明金属探测仪跟收音机的原理差不多，我自学了那么多电子技术，很想进一步了解详情，并表示若有可能，我也来做一台。龚师傅非常支持我，没多久，那台金属探测仪就送到我手上。

为了试制金属探测仪，我曾到刘医生家去拜访过。刘医生终身未婚，领养了他哥哥的女儿为养女，他全身心地扑到畜牧业上，休假日几乎都在图书馆中，查阅国内外有关资料，他不仅精通兽医疾病诊断和治疗，而且在畜牧育种和应用等技术领域都有贡献。

在南片合作组试制冷冻精液期间，刘医生到图书馆里查阅了大量有关冷冻精液的海外文献，通过侯根福师傅把很多宝贵信息和试验方向带给南片合作组。在刘医生家里，我遇见他的养女，她告诉我，西郊公园也常常请刘医生去为各种动物治病，有时甚至需要把针筒绑在竹竿上，远距离地给老虎打针。凡是与刘医生一起工作过的人，无一不被他对畜牧业的奉献精神而感动。

从刘医生那里拿来的金属探测仪，控制器由电子管组成，探头很大，长 30cm 宽 20cm，内有两个偶合在一起的大线圈，与控制器中的电容组成 LC 振荡回路，当有铁器出现在探头磁场内，振荡频率改变，这个变化信号由音频放大器输到耳机。

知道了原理，就能着手试制了，我在家中的亭子间里摆开了摊子，大哥帮了很多忙，陪我到处采购元件，我采用晶体管取代电子管，设计了信号放大线路，又自行绕制两个探头线圈，用环氧树脂板制作了探头支架。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可以调试了。等到用一铁丝出现在探头上时，扩音器里出现了“嘟……”的叫声，终于成功了。

妹妹们至今还记得我在亭子间里调试金属探测仪的叫声。但是，我终究是初出茅庐，学艺不精，靠单打独斗研制出来的探测仪灵敏度不如刘医生的那台。可能是我设计的探头太小：长 20cm 宽 10cm，只注重了加大电感值，没考虑到探头的尺寸：探头越大，磁场越大，探测深度就越大。如今回想起当年的我，还真是年轻无畏，精神可嘉！

## 结束语

四十多年后的今天，中国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沧海桑田，当年牛棚里的许多事，现在已成为历史：机器挤奶取代手工挤奶，甲沟炎和腱鞘炎不再发生；大型奶牛场里分工细致，没有什么人牛情；不再文化大革命，当然也不再发生牛与鬼的故事了。不过，还有许多事情没有变：奶牛必须经过怀孕产犊后才能泌乳，人工授精员们依然要光着膀子操作。

当年分配到牧场的 66 届高中生们，现在海内外各显神通，大展宏图。师傅们在改革开放后也迎来了他们人生的辉煌时期：顾根余师傅担任过六牧场的场长，龚明奎师傅担任上海奶牛研究所所长，为全国各地培养了几百位牧场技术人员，桃李满天下。

说实在的，写出我人生中这段时期的故事并不是一件开心的事情，中国十年浩劫，我牛棚十年。回想那段牛棚岁月：繁重单调的劳作，漫长的等待，无果的奋斗，还有那丑陋的领导。幸好还有淳朴的同事，敬业的技术人员和可怜可爱的奶牛，是那段时期灰色回忆中的闪亮光点。我的十年牛棚经历平淡无奇，把这些点滴经历记录下来，只是想反映那个年代的荒唐，还原部分可能被淹没的历史年代，希望这些真实的故事有些价值。

谨以本文献给我牛棚十年中的同事们！

叶秋怡

2016 年 10 月初稿

2020 年 8 月定稿

纽约上州

## 跋

2015 年秋回沪探亲，与牛奶公司丁丽娟老师和陈星焰老师相聚，提及当年奶牛育种的情景，我随口说想写些牛奶公司技术人员的回忆。探亲回美后欲提起笔来，才感到落笔不容易。我虽然敬重牧场的技术人员，却从来没与他们真正共事过，能写的只是一些有关他们的浮光掠影，更多回忆是自己养牛挤奶的经历，只得改变写作方向，把自己以前陆续写的几小段牛棚回忆拼在一起，再加上有关奶牛育种和技术人员的故事，凑成了《牛棚十年》。

2016 年秋初稿完成，在回沪探亲时，将初稿给亲朋好友，征求意见，再次修改，几乎是重写了关于奶牛技术的部分，占全文的 1/3。龚师傅刘医生有很多感人事迹，可惜我知道得太少，没能详细写出，深感遗憾。

感谢陈星焰老师给我找来了“上海奶牛简史”，感谢老同学吴嘉宝编辑的《中国乳文化与科学》。这两本书在我写作中提供了很多帮助。

写出初稿后收到牛棚同事的反馈和建议，令我感动，成为我修改和完稿的动力，深表感谢。

此文原名《牛棚十年》，但是“牛棚”这个词可能比较敏感，故改名为《牧场岁月》。并将文章分成两篇：上篇为“养牛挤奶”，下篇为“牛棚里的科学”

## 参考文献

1. 上海奶业简史，上海奶业行业协会《奶业史》编委会，2010 年。
2. 上海滩奶牛往事，  
[http://www.archives.sh.cn/shjy/scbq/201209/t20120913\\_36405.html](http://www.archives.sh.cn/shjy/scbq/201209/t20120913_36405.html)
3. 中国乳文化与科学，吴嘉宝编辑，2008 年。
4. 袁英巧\_百度百科：  
<http://baike.baidu.com/item/%E8%A2%81%E8%8B%B1%E5%B7%A7/3101585?fr=aladdin>

# 牧场岁月（再篇）

## —厂医琐事

我在牧场十年中的最后两年（1975年8月至1978年2月）被调离牛棚，当上了厂医。两年的从医，在我四十多年的职业生涯中，虽然仅占极小部分，却留下一些有趣的回忆。

### 业余学医与红医班

第十二牧场的总部离上海第一医学院很近，它的附属医院：中山医院就成了我们的劳保医院。中山医院的医疗资源齐全，主要治疗大病和疑难杂症。牧场职工无论大病小病都到中山医院就诊，挤在一大群重病者中候诊，等上大半天，看病几分钟，不少职工去看病只是为了拿病假单。中山医院屡次要求十二牧场建立自己的医务室，以便自行处理一些小毛病以及开病假。直到1975年夏，牧场领导决定在牧场里建立医务室，把我从牛棚中调出，担任厂医。

我从小就很喜欢医学，在中学时是班上的卫生员，还学会一些包扎急救方法。我家订了很多报刊杂志，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爸爸妈妈被打成牛鬼蛇神，他们单位来我家抄家，抄走了大量书籍杂志。在幸存的书籍中，有一叠《大众医药》杂志，就成了我业余学医的入门书。《大众医药》的内容涉及各医学常识，通俗易懂。我认真地一篇篇地看，做了许多摘记，学到很多基本的医药常识。除了这些《大众医药》杂志，我还去买医药书，那时候，在福州路旧书店有医科大学的各种教材书，我都去买了下来。在业余时间躲在牛棚宿舍里，一大本一大本地啃。我的自学方法很幼稚，看一段，做一段笔记，把摘要记下来，读到精彩的部分，就大段地抄下来。那些医学院的基础课教材还能看懂，读到病理生理学就很难啃下去了。这样的自学效率很差，既没有同学交流，也没有实践与考试，只是勉强学到一些医药常识，业余学习主要还是自己心灵上得到安慰。

牧场的兽医金剑影医生每天到牛棚来巡视牛群，他知道我想学医，一天兴冲冲地带给我一本解剖书，说是从他姑父那里借的。那书的封面上写着周渭良大名，周医生与是我家是世交，我家里人生病，总是去找周医生。他的太太金芳贞是妈妈最要好的中学同学。周医生是位杰出的医

生，反右时不幸被划为右派，当时在漕溪路地段医院当内科医生，他以精湛的医术，治愈了很多病人，更可贵的是，他虽然是正规西医教育出来的医生，在行医过程中，却也能娴熟地用中医药治好许多疑难杂症。在我们那个地区，周医生享有很高的声望。

我得到周医生的人体解剖书，如获至宝，认真地把解剖图一张张地描下来。在漫长繁琐的描图过程中，逐步熟悉人体内部的结构。妈妈很赞成我业余学医，一次在北京当医生的表姐来访，妈妈告知我在描人体解剖图。表姐听了大为惊讶：“如今就连医学院学生都不学人体解剖学了，一个工人学这个干嘛？”

我在建立牧场的医务室之前，先去参加一个红医班学习，是中山医院的门诊办公室专为培训厂医而组织的，为期两月。每天下午上课，课程的包罗面很广，内科，外科，五官科，皮肤科，精神病科等等。讲课的医生都是从医多年的医生，有丰富的临床经验，讲课深入浅出，有的医生颇有幽默感。周渭良医生也来红医班讲课，他的讲课尤其生动。下课后，周医生被同学们簇拥着，纷纷向他提问打招呼，我没上前相认。

除了课堂上课之外，红医班还安排我们到医院去观摩实习。印象深刻是精神病科的课程和观摩，讲精神病课的医生讲解了精神病的分类，临床表现和治疗预后。他冷静略带幽默地给我们讲述各种的精神病例。还再三强调，不要把精神病人当正常人，他们是病人，不能通过讲理或教育来治病，精神上的病是无法用理智来治愈的。上完课后我们还去精神病医院参观，让我们直接和几位患者交谈，那些病人荒谬的谈吐，麻木的神情，令人感到可怜悲哀。



与红医班部分女同学们合影

红医班的同学中，大都是已经在厂医务室里工作，都有几年至十几年的从医经验，来此听课只是进修，增进业务知识。故而同学们对老师提出的病例都耳熟能详，往往能立即讲出病因，症状和治疗方案，应答如流。我虽然自学了很多医学知识，但缺乏从医经历，对许多病例茫然不知，只能甘拜下风了，这与我在业余工大上电子技术课的情景截然不同，在那里我总是名列前茅。

红医班的课程安排是上午在医务室工作，下午到红医班上课。十二牧场里尚未建立医务室，我被安排在每天上午去金星金笔厂，跟着那里的厂医学习，就像师傅带徒弟那样。这段时期的实习非常有用。

金星金笔厂很大，员工多达几千人，不仅有总部医务室，还有几个车间医务室。那时，大部分车间已转成生产电视机，只保留了钢笔车间。我被安排在钢笔车间的医务室，跟那里的厂医何医生学习。何医生是宁波人，原是制钢笔的老工人，几年前调去接受些医学培训，担任了钢笔车间的厂医。在行医的空闲时，何医生给我讲他以前当工人的故事。金星金笔厂是三个宁波人在海外留学后回到上海合伙开办的，他们在宁波家乡开办了学校，培养家乡子弟，从学生中挑选品学兼优的青年到金星金笔厂里工作。公私合营前金星金笔厂的职工待遇非常好，老板请了厨师给职工们做饭，每天早上，职工中派出一人带着厨师去菜场，厨师拎着菜篮跟在职工后面，那职工在前面指指点点，指挥着厨师买这买那。老板还请医生定期来厂里给职工检查身体。每周有两个晚上，职工们在厂里俱乐部里跳交谊舞，那日子过得真是舒服。公私合营后，这些待遇都取消了，有些不识时务的工人心里不满意，怪话连篇。在接踵而来的反右运动中，有不少老工人被戴上了右派的帽子。

虽然何医生是半路出家，但是从医多年，对医学界很有见解，他告诉我，医学界各科有大科或小科之分。大科是指胸外科，脑外科等，小科是指皮肤科，五官科等，一般来说，女性往往只能在小科里当医生，而大科医生只有少数强壮能干的男性才能胜任，他们在医务界的地位很高。我后来在行医时常常想起何医生的那番话。

我不仅跟着何医生学当厂医，学习如何问诊，诊断，开药，还常去总部医务室，那里的护士教我打肌肉注射与静脉注射。那时中国大陆食品匮乏，人们普遍营养不良，肝炎流行猖獗，就连很多内科医生都患上肝炎，肝炎是内科医生的职业病。上海市各个区和工业局都有肝炎隔离病房。金星金笔厂的总部医务室每周有两个早上提供抽血服务，患肝炎职工需经常化验肝功能。我为了提高静脉抽血技巧，也去帮忙抽血。记得那时天还没亮，候诊室里已有黑压压一群人等着，都是来空腹抽血查肝功能的。



## 厂医的日常工作

两个月的红医班学习结束，我回到十二牧场，着手建立医务室，牧场分布在东西两部，在东片的总部和西片的分部都建立了医务室。上午在东部的医务室里当值，中午骑自行车到西片，就如牧场的兽医和人工授精员那样，东片西片地两边跑。相比起牛棚里当挤奶工，厂医的日常工作轻松多了，就是为全牧场 260 个员工做些简单诊断，开药，配药，开转诊单，开病假单，等等。小病自己处理，大病开转诊单，把病人送到中山医院去就诊。

厂医不仅是医治职工的小病，还得参与卫生防疫工作。那时，上海地区建有卫生防疫网，及时向基层医务人员通告有关流行病爆发等卫生防疫信息。十二牧场医务室建立后，纳入当地的医疗防治网，称为块，我们那个块由 6 个单位的医务室组成，为首的是鞋帮二厂的黄医生。记得有一次块里告知，急性肝炎可能在近期爆发，我按照块里提供的中药配方，泡制了茵陈汤，用空牛奶桶装着，送到各牛棚给员工喝，预防肝炎。

厂医还得参与推行计划生育政策，在 1975 至 1977 年间，是推行计划生育很严格的时期。许多厂里的医务室甚至还负责发放妇女月经纸，以此监督育龄妇女是否受孕。在我们牧场，这件事由年长的妇女干部负责。那期间，牧场里的那批 70 届毕业的女工们大都结婚生子，我与妇女干部经常去产妇家探望与贺喜。一年后，育龄妇女再次怀孕，于是就得陪着她们去医院做人工流产。在产科手术室外等待时，见的情景真令人不好受，接受人工流产的妇女们个个神情沮丧，默默地等待着，妇产科医生在施行刮宫手术后，随即就把节育环放进子宫。接受人工流产的妇女有两周的假期，我和妇女干部常去家访，看到去年出生的孩子在满地爬，孩子的妈妈则躺在床上，勉强打起精神和我们交谈。

工作空闲时，我去家访那些长病假的工人。曾去探望一位患慢性肝炎的工人，见到他家徒四壁，生活很艰难。我的家访令他非常感动，事后与人讲：“我病假这么长时间，只有小叶来看望过我。”其实，在上班时间去探望生病职工，这本来就是我的工作。没想到我这举手之劳，他竟如此感激。想起爸爸妈妈曾说过的一句老话“公门里面好积德”。意思是身在公门（衙门）里，有很多机会可以行善积德，当然也容易行恶作孽，善与恶只在于各人内心之中。

在牧场当厂医，每天面对的最大挑战不是人体的疾病，而是如何处理职工混病假的情况。那时的中国，人们没有工作热情，干好没奖励，干坏不受惩罚，唯一能偷懒占便宜的就是混病假。职工每季度每人有六元奖金，若该季度的病假天数超过六天，这个季度的奖金就没有了。厂医有权开病假，面对职工的没病装病前来混病假时，我处于两难的状态。牧场工人中挤奶工占了大多数，挤奶工作是一个萝卜一个坑，若一人病假，就得派人顶上去，顶工的人叫做大轮休，牧场有

五六个人专门做大轮休的。若我开的病假人数太多，安排大轮休的经理就会向我抱怨，他已经没人手安排了。那时，我得自己去牛棚顶挤奶工的班。我当过挤奶工，深知工人们的工作辛苦，来到医务室看病，所求的不过是一季度六天的病假，一般情况下，我尽可能满足他们，一旦六天假期满了，即使真的有病，为了拿到那六元的奖金，他们能熬就熬过去了。有人装病装得实在太假，我虽然给开了病假，但也暗示他，我知道他装病，请下不为例。

厂医有了些小权力：开药方，开病假等，就会有人来套近乎。我尽可能避免欠人情，吃人嘴短，拿人手短，以免因抹不开情面而违反规章制度。两年后来我离开牧场，上了大学，同班的六个女生住一间宿舍，同学之间常有好东西互相品尝，我却很少参与，她们开玩笑地说：“小叶是拒腐蚀，永不沾”，大概是我当厂医时的拘谨自律，已经养成习惯了。

## 黄医生

在我们医疗防疫块里，我结识了其他单位的厂医。厂医虽然都统称为医生，但是各位医生的学历不同，有的是护士学校毕业，有的只接受过几个月的简单培训。也有少数是经过正规医学大学教育的，被称为高年资医生。带领我们医务防疫块的黄医生，就是一位高年资医生。他是我初中同学的父亲，曾应邀来学校作过讲座，给我们讲述过他的经历。黄医生医学院毕业后，先在大医院里当放射科医生。那时，医院设备简陋，胸部 X 光检查时，病人紧贴着屏幕，X 光射线源在病人身后，射线经过病人胸腔射到屏幕成像。放射科医生坐在屏幕另一面，双手扶着病人的身体左右移动，在屏幕上直接观测胸腔内是否有病变。虽然医生身着防护衣，但是扶着病人身体的双手则暴露在 X 射线下，久而久之，手部受到长期辐射伤，有的医生连手指甲都长不出来。后来，黄医生到私营工厂里当厂医，那时候，私营工厂主不惜重金，聘请医生，当厂医的薪资是很优厚的。

高年资医生当厂医，无疑是大材小用。黄医生不愧是位能人，即使在厂医这个岗位上也做出很多新颖的事情，搞得风生云起。他不仅行医经验丰富，工作认真，有很多东西值得我学习。厂医不仅是医治厂里职工的小病，还负责职工的卫生和防病，因此，平时的统计工作很重要。那时候电脑技术尚不发达，没有 Excel 那样的电脑软件。黄医生把每个职工的主要健康信息制成卡片，便于查找。还设计定制了一个很大的图章，长 3 寸宽 2 寸，上面列出了健康信息项目，图章在空白卡片上一按，就出现一空表格，填入所需信息，大大简化了制卡的工作量。

我虽然当了厂医，对畜牧业的兴趣依然不减，在厂医工作之余，还参与牛奶公司的良种牛普查。乳牛育种需要大量的数据统计，牧场的每头母牛都应有血统记录。然而当时在这方面的工

作尚未完善。我从黄医生的大图章得到启发，设计了一个类似的大图章用于乳牛育种，把每头母牛的上五代的父系和母系的信息都填入表里。牧场的技术人员采用了这大图章制作卡片，极大方便有效地统计乳牛的品种信息，其他牧场的同行们得知此事后，都前来借这大图章去仿制。

## 外科小手术

1976年夏天，我们的卫生防疫块里新来了一位高年资医生，曾在部队里当外科医生，不久前从部队转业回上海，原先分配到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外科。他不愿去大医院，因为在那里外科医生工作量太大，自愿到金属首饰厂当厂医，工资待遇相同，工作轻松要得多。金属首饰厂在鞋帮二厂隔壁，与我们同属一个卫生防疫块。现在我记不起他的姓名了，就称他军医生。军医生到底是手艺在身，不愿轻易放弃手术刀，他提出要教块内的厂医做手术，以解他的一时手痒。

我听说能学习外科手术，当然求之不得。于是，每周两次，冒着酷暑，骑自行车到鞋帮二厂医务室，与那儿的厂医陈水云一起，跟着军医生学习开刀。我们先在鞋帮二厂医务室里上了几堂外科基本知识课，接着就要实践。这在那时倒是很好办。中山医院很爽快地安排我们到门诊外科去做手术，因为那儿总是缺人手。军医生带着我们俩去了门诊外科好几次。前两次是熟悉手术准备前的步骤，观摩那儿的医生操作，等等。记得我第一次戴橡胶手套时，双手笨拙地往手套里伸，因为太紧张，连规定的步骤都错了，那手术室里的护士狠狠地瞪着我，教训道：“怎么能这样戴手套？”骂得我很狼狈。

门诊外科里有五六间手术室，我们先观看了两位手术医生切除病人额前的皮下脂肪瘤的手术，那位手术医生很匆忙，病人的头发部位虽被包裹住着，额前的几束黑发还是露了出来，耷拉在刀口上，浸没在血水中。医生也不在乎，把那几束头发随便拨开，继续开刀，取出脂肪瘤。手术结束后，那两位医生摘下了口罩，换回便服，这才发现他们很年轻。看着他们吹着口哨，潇洒轻松地走出手术室，军医生摇摇头，对我们说：“这连基本的消毒步骤都没做好啊。”

一般来说，门诊手术是那些术后不需特别的护理的手术，大部分是简单的皮下手术，然而，也有一些手术很复杂，尤其是颈部的皮下手术。在观摩期间我们看到一次颈部肿瘤的活检手术，躺在手术台上的女病人在呜呜咽咽地哭，手术医生手里忙着，一边轻声地劝说：“你不要哭了好吗？再哭的话，医生的心都给你哭乱了，就更找不到肿瘤了”。因为颈部的血管神经很复杂，原先开刀前容易从体外摸到肿瘤，但是一切开刀口，却很难找到。故要特别小心，尤其不能在切除肿瘤时把其他的血管神经伤了。

后来，轮到我们在中山医院门诊外科实践时，偏偏遇到了一次颈部肿瘤活检手术。那次是军医生主刀，我当助手。患者是位农村妇女，左侧颈部肿瘤，贴近皮肤，很大，摸上去硬硬的。看来，开刀后找不到肿瘤的情况不会发生。不料，切开皮肤后，刚切入肿瘤，一股液体笔直冲出，直射到军医生的脸上。我吓得不知所措，军医生闭着眼，急切地吩咐我：“赶快帮我擦！”我擦去他脸上的积液，他继续吩咐：“擦眼睛！擦眼睛！”我狠下心，拨开他眼皮，用干纱布认真擦了一遍。接着，军医生从那已经瘪下去的肿瘤上取一小块活体，匆匆结束这手术。后来，活检结果证实那位女病人的肿瘤已癌变。需住院切除。事后想想有些可怕，听说曾有医生因沾上癌变的液体而患了癌症。祝愿军医生好运！

在中山医院实习了几次，就要在工厂的医务室里实践了。黄医生神通广大，在鞋帮二厂的医务室里辟出一小间作为手术室，第一台手术是切除患者额头上的皮下脂肪瘤。患者是军医生所在的金属首饰厂里的一位青年工人，我主刀，军医生当我的助手。我们严格按照外科步骤，洗手消毒戴手套，病人头部遮住，只露出需手术的部位。我拿着手术刀，有些紧张，第一刀切下，切歪了。军医生轻声喝道：“拿稳刀！这是人的面孔，不小心要毁容的！”我定下心，认真操作，在军医生的指导下，终于把手术顺利做完。手术后好几天，我一直在为那切歪了的第一刀忐忑不安。后来军医生告诉我，那位青工恢复良好，额头上的刀疤几乎看不出来，他还非常感激我和军医生呢！



军医生与我在鞋帮二厂的医务室里动手术。

医生职业中最令人敬仰的是外科手术医生。作为厂医，能有机会学做外科手术，实属幸运，这也只有在文革期间才会发生的特例。这些手术实践令我认识到，挤奶工的粗壮手指实在不适宜当一名外科医生。

## 几件医案

虽然厂医日常处理的大都是些小病，两年中，偶而遇到一些印象深刻的病例，值得一记。

### 病例之一：感染性休克

曾经遇到过一次感染性休克的病例。那天早上我上班，听说牧场的场长老张病了，他平时住在总部小楼的阁楼里。我上楼去，看见老张躺在床上，状态尚好，他告诉我，是拉肚子，昨晚已经到中山医院去看过病，医生说没大事，给了些药。我量了他体温，38度，偏高，摸他脉搏，却摸不到。我以为是自己水平不高，也没在意。不料到了中午，场部干部王振家上楼探望，老张说：“老王，我眼睛看不见了！”王振家赶忙驮着老张从阁楼上下来，招呼场部的卡车立即送往中山医院急诊室。那位急诊医生开始也不怎么重视，懒洋洋地问他病情，待到测量血压，发现极低，这才警觉起来，马上进行静脉滴注，注射升压素，此时已经有些晚了，老张开始出现明显的休克症状，他大声呻吟着，呕吐出黄绿色的液体，极度难受。直到静脉滴注了一会儿，升压素开始起作用，人才渐渐平静下来。随即，医生将他收进住院病房。第二天早上，我再去医院看望老张，正逢主治医生在查房，身后跟着一大群学生，主治医生告诉学生们：“此人是典型的大叶性肺炎，一般在24小时之内会出现休克。”想起昨天早上我摸不到他的脉搏，估计那时已经开始进入休克。如果我当时测量血压，或许会发现异样。但是我没经验，摸不到脉搏，还以为是自己的技术不好。

感染性休克非常凶险，此时机体循环功能急剧减退，全身血管塌陷收缩状态，不能提供足够的循环血量，以致全身器官处于严重的功能衰竭状态，所以老张会出现失明，呕吐胆汁等症状，病人生命岌岌可危。那位急症科医生立即进行抗休克措施：静脉滴注升压素，以扩充血容量。这才挽救了老张的生命。感染性休克并不常见，红医班培训时也没提到，我很早以前就在《大众医学》上读到“休克”这个医学名词，这次见到休克危象后才牢牢记住。医生的经验就是靠一次次的经历而积累起来。

### 病例之二：心包炎：

这个病例的患者不是牧场职工，而是我的远房侄子豪杰。那年豪杰才18岁，他父母带着他来我家求助。豪杰病恹恹的，肚子鼓得很大。曾经到上海第一人民医院看过，胸部X光透视报

告说是肝肿大，怀疑是血吸虫病引起的肝腹水，因为他家就在血吸虫病肆虐的江南水乡。但是血液化验却找不到血吸虫病原体，豪杰的病就被耽搁下来。

我作为十二牧场的厂医，经常去中山医院门诊办公室联系业务，与那里的医生护士很熟。为豪杰在中山医院挂个号看门诊不成问题。那天陪豪杰去看门诊，正巧遇到心脏科的女专家李医生，一大群学生跟着她，她仔细听了豪杰的心脏后，对学生们说：“这人有第三心音。”第三心音意味着心脏受损。以前的诊断都是怀疑血吸虫病引起肝脏受损，现在怎么怀疑是心脏有病？我满怀疑惑，在门诊办公室里说起此事，那里的护士也不以为然地说：“李医生是心脏病专家，她什么病都往心脏病上想。”

要确诊心脏有病，还需拍一张X光胸大片，那时医疗资源紧张，医院的X光大片需要有配额，几经周折，终于拍了X光胸大片，诊断结果是心包炎。我问中山医院的放射科医生：豪杰在第一人民医院曾做过X光透视，那报告上写着肝肿大。为何同一个病人的X光检查，竟有如此不同的结论？中山医院的医生听后并不辩解，只是笑笑说：“各人有自己的见解嘛。”可见，照X光只是一种检查手段，如何解释检查结果就要看医生的专业水平了。那位心脏科专家李医生真了不起，仅凭心脏听诊，就能听出第三心音，怀疑是心肌受损，从而把诊断引导到正确方向。

确诊了心包炎，豪杰需住院开刀。那时医院很不愿意收治来自农村的病人，因为农民没有劳保，没钱治病，往往是病治好病人没交钱就跑了。我请第十二牧场开个证明，豪杰的住院费先从牧场的劳保医疗费中支付，我以后再付给牧场。有了医药费的保证，豪杰很快就住进中山医院。

胸外科是中山医院的强项，那儿有全国顶级的胸外科医生和设备。早期的心脏手术是将一段肋骨锯断，开出一个小心口，外科医生通过小孔进行心脏手术，这种方法看似创伤小，但是因手术操作不易，耗时太长。到上世纪70年代，已不再采用这方式，而是切开连接胸骨和肋骨的软骨，把整个胸腔像一本书那样全部翻开，露出心脏，这样，手术操作容易快速。手术结束后，再用绑带把胸腔紧紧绑住，待软骨长好后，把胸骨和肋骨联接上。

豪杰的手术进行顺利，医生打开胸腔，正常心包膜厚度小于1毫米，而豪杰的发炎心包膜已厚达11毫米，心脏被厚厚的心包膜紧裹着，无法正常搏动，大量的静脉血滞留在门静脉，造成门静脉高压，从而引起腹水。医生把发炎的心包膜剥离，然后关闭胸腔，手术顺利结束，为豪杰治疗的主治医生是王医生，强壮，专业，自信，待病人耐心亲切。我见到这些胸外科的手术医生，不由得想起何医生提到的大科医生，他们可真是神气啊！



经过痛苦的手术后恢复期，豪杰终于能出院了，他还需服一个疗程的抗结核药，因为心包炎大都是结核菌引起。豪杰从此要注意保重，正常人的心脏有心包膜包裹，心脏浸在的心包液中跳动，而豪杰手术后的心脏是裸露的。不久，中山医院的账单送到十二牧场，如此大的手术，再加上三星期左右的住院，总共花费了人民币 130 元！我垫付了这笔钱，豪杰父母很快把钱还给了我。

## 中医的魅力

我对中医一直非常敬佩，中医不仅自学容易，还可以自己进行一些简易中医治疗。早在当厂医前，我就时常给爸爸打金针治头疼，给妹妹打金针治腱鞘炎，等等。牛棚里的清洁工宋妈也请我给她打伏针，即在三伏天里打金针，据说对人体有好处。有一次打伏针，宋妈还晕了针，幸亏后来没事。

1971 年秋，为了响应“全国学习解放军”的号召，牛奶公司组织职工在上海郊区“野营拉练”，拉练中的一天晚上，我们女工们打地铺睡在谷仓里，半夜里，八牧场的一位女工小陈胃病发作，哼哼唧唧地哭，惊醒了周围的人。我虽然是拉练的卫生员，却手头没药，只能采用耳针疗法，在小陈的耳朵上找到痛点，进行刺激。针刺了一会，小陈只顾着耳朵针刺的疼痛，胃疼已完全消失。一年后，我跟着畜牧技术人员们到八牧去调查良种奶牛，又遇见小陈，她见了我分外亲切，说自从那次拉练我给她用耳针治胃病后，再也没有胃疼过。我说，那可能是你从此注意饮食了吧。她说，不是的，她现在吃东西反而很随便，吃什么都没事。再也不象以前那样小心翼翼地护胃了。

在当厂医期间，更有机会感受到中医的魅力。一位女工因腰扭伤来就诊，我让她站着，双手前伸，在她前臂的相应穴位扎针，在留针的同时要求她扭动腰，结果真的把腰伤给治好了。大概是因为腰伤是新伤，能及时治愈。倘若是老腰伤，可能没那么好治了。

我还喜欢自己配制一些简单的中药，如将中药青黛散调在凡士林里，就成了青黛膏，可治湿疹，有女工因使用了青黛膏的疗效显著，后来再来要，我得知自制的药膏有效果，当然也很欣慰。夏天蚊虫多，医务室向职工提供痱子水，痱子水照着配方很容易配，只是配出的痱子水透明无色，就滴进几滴蓝墨水，就和市场上绿色的痱子水相差无几了。

## 四人帮倒台了

1975年夏我调任厂医时，已是文革后期，中国的政治形势时时在变化。邓小平复出不久，又被定为右倾翻案，就连红医班也得参加批判邓小平右倾翻案风的革命活动。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9月底在人民广场举行盛大的追悼大会，各单位必须派人参加。一个多月之后，在人民广场举行打倒四人帮大会，我不再在牛棚里当班，凡是这些活动都得前往参加。

10月6日四人帮被抓，消息传出，老百姓们群情激奋。记得10月上旬的一天早上我骑车上班时，兴奋激动，因为前天下班回家，听我二哥说：“四人帮被抓起来了！”我来到牧场东区的总部，走进医务室，感到异常安静。仔细察看，原来往日对面铁工厂传来的机器轰鸣声没了。从窗外望去，发现铁工厂里的工人把机器都关了，围成一圈，正在热烈地聊天。四人帮倒台的消息实在太震撼，工人们索性活都不干了，兴奋地交流着喜悦之情。

那天中午，场部有卡车要去西区，我搭车同去，途中，卡车顺便到华东局附近的康平路去看大字报。到了康平路，只见人行道旁的墙上已经贴了不少大字报，人们簇拥着在看大字报。突然一阵骚动，只见几个人在追赶一名男青年：

“抓住他！他在抄写大字报的人名！”

“他在记黑名单！”

“他想秋后算账！”

那男青年抱头鼠窜，在人群里落荒而逃。人们纷纷愤怒地向他吐痰责骂。我们见他狼狈不堪，担心他被抓住后被打受伤，就把他拉上了卡车，卡车立即开动，驶离人群。那男青年上了卡车，气喘吁吁地蹲坐在卡车的一角，只见他文质彬彬，衣着考究，像是个科室人员，身上那件笔挺的蓝色涤纶外套上挂满了鼻涕痰迹，明奎师傅盘问他：

“为什么要记黑名单？”

“不为什么！”

“你是哪个单位的？”

“插队落户的！”

插队落户青年，当时是被全社会同情的对象，这些城里孩子远离上海，在农村日夜劳作，没有单位，没有工资，过年时带上当地的土特产，扒上火车回家，遇到查票的，说：“阿拉是插队落户的，阿拉没有钱，阿拉要回家！”还指着地上的行李说：“这些，阿拉也要带回家！”乘



务员对插队落户青年毫无办法，只得眼开眼闭地放行。然而眼前这位文质彬彬的青年，细皮嫩肉的，丝毫没有风吹日晒务农种地的痕迹。哪里像是插队落户的！我们明知他没说实话，也不想再追问，到了一个僻静的路口，就让他下车离去。

四人帮的倒台，深受四人帮荼毒的中国广大老百姓兴高采烈，扬眉吐气，大快人心！然而，中国的文革浩劫，到1976年历时十年，从上到下已经建立了完善的效忠四人帮的各级党政领导，文革抬高了这些人，使他们得以凌驾于老百姓之上。他们受惠于四人帮，便自觉地助纣为虐，积极迅速地执行四人帮的种种倒行逆施的政策，甚至还变本加厉地肆意发挥。难怪在1976年10月上海的当政者还企图组织工人武装反抗中央。就连在小小的牛奶公司内，一帮极左的女干部听到四人帮倒台的消息，躲在房间里，一起抱头痛哭，如丧考妣。所幸的是，四人帮的倒台是一场不流血的政变，除了一小撮四人帮余孽被绳之以法之外，四人帮建立的各级领导都很精明，他们的为官技巧本来就是见风使舵，便不失时机将自己装扮成文革的受害者，在改革开放中再度春风得意，大肆获利。他们有时还会技痒，忍不住地怀念文革中的风光，每见到这些人的表演，我就会联想起那个男青年身上挂满的鼻涕浓痰，好恶心！

## 高考恢复

1976年10月四人帮倒台，文革终于结束了！中国形势在日新月异地变化着。1977年夏，消息传来，高考要恢复了。牧场中的66届高中生们兴奋不已，大家认真迎考，高考过后，到了填报志愿的时候，第一次面临选择人生的机会。

我已经是厂医，是否要报考医学院，继续当医生？行医的经历令我深刻体会到，医生的经验最为重要，需要从一次次病例中逐渐积累。我已经被耽搁了十年的宝贵光阴，今后若要当个好医生的可能性不大。理工科与医科不同，理工科固然也需要经验积累，但是更注重的是理性分析与果断决策。考虑到要急起直追，夺回失去的十年，我决定报考理工科，希望将来能当名工程师。

虽然我不再从医，但是在这两年行医中，我初步体验了医生的职责，看到专业医生的辛劳和职业病，结识一些医学界的良师益友。更有幸能有与中山医院打交道，遇到一些非常优秀的临床医师，为他们的精湛医术所折服。两年的行医经历，令我在今后人生中受益匪浅。

叶秋怡

2020年1月

纽约上州